

## 「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 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

藍弘岳\*

本文企圖從跨語言和文脈的思想史角度來解釋「帝國」概念如何在中國乃至東亞漢文圈中開始被翻譯、接受與流傳的過程。首先，本文討論在歐洲語言中與「帝國」相關的 Imperium 等概念語群的意義如何演變的過程。然後探究在古典文言文中，「帝國」這一詞彙原本所指為何。其次，論述「帝國」一詞在與中國共有漢文脈的德川後期，蘭學者如何將之做為 Keijzerryk 和 Empire 的譯語使用，之後又如何被儒者和國學者理解、使用，從而有日本特殊語意的過程。然後，就《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編纂過程，及清末中國對日本立憲體制的模仿過程，主要闡明「帝國」概念與體制媒介一種源於西方國家的日本式君主立憲國家制度之創立的意義，進而論述正是這種「帝國」概念與體制成為清末大清政府與知識人認為可學習效法的對象，使得「帝國」概念開始在中國廣泛使用。然本文也強調「大清帝國」和「大日本帝國」畢竟承載著不同的歷史，故對於「帝國」的想像也不盡相同。藉此，本文主張討論東亞漢文圈如何接受西方政治概念時，除需考量漢文脈具有的媒介意義外，更要注意各自社會、國家之歷史與語言脈絡差異的問題。

**關鍵詞：**帝國 漢文圈 翻譯 幕末日本 清末中國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是科技部計畫 (106-2628-H-001-002-MY3) 和教育部深耕計畫「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之子計畫「漢學與近現代東亞的政治思想：民族主義和世界秩序」共同研究成果之一。

## 一・前言

當代人文社會學科中，「帝國」已是一個重要的分析概念。有學者從歷史學或歷史社會學的角度，主要將「帝國」理解為前近代統治廣大領域且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傳統帝國體制國家）來分析。<sup>1</sup> 但如後述，本文強調所謂傳統帝國體制國家又可分為由承神意、天命乃至民意之皇帝統治的君主制國家，及如共和時期的羅馬帝國一樣，不一定由皇帝統治但管轄領域大且多民族的國家。

另一方面，相對於傳統帝國體制主要是「陸地帝國」，隨著「海洋帝國」代表「大英帝國」的發展，「帝國」一詞被理解為近代向外擴張且擁有許多海外殖民地的國家。對於此種近代意義的帝國，約莫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從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意義的「帝國主義」論，指涉其為「帝國主義國（家）」（後述）。後來，在人類學、文學、歷史學等領域中，受後殖民理論等影響，強調其向外殖民的面向，故稱之為「殖民帝國」（「殖民地帝國」）。<sup>2</sup> 也有學者以「國民帝國」指涉其為在近代主權國家、民族國家體制基礎上展開的帝國體制。<sup>3</sup>

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在全球化和以美國為單一霸權的世界格局形成的背景下，在國際政治、區域研究等研究領域，有以「帝國」概念來指涉一種當代世界的霸權國家美國的研究，<sup>4</sup> 也有以「帝國」指涉一種新的在全球視野下展開的脫中心、脫領土化、非國家單位的主權形態，即「在單一國家的統治邏輯下，由許多國家的與超國家的組織所聯合而成的主權」。<sup>5</sup>

同樣，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帝國」做為一種不同於民族國家，統合多種政治集團的政治空間概念，也受到歷史學者注意。特別是在英國史研究領域中，有別於重視經濟與政治的舊帝國史，開始「帝國轉向」，從更重視文化、性別和族群等面

---

<sup>1</sup> 這方面的代表論述有 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中文版為 S. N. 艾森斯塔得著，閻步克譯，《帝國的政治體系》（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杉山正明在〈帝國史の脈絡——歴史のなかのモデル化にむけて〉（山本有造編，《帝國の研究：原理・類型・關係》〔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頁 31-85）中，除前近代的帝國外，也對包括大英帝國與當代美國霸權在內的世界史上諸種帝國有很完整的歷史分析。

<sup>2</sup> 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等。

<sup>3</sup> 山室信一，〈「国民帝国」論の射程〉，山本有造，《帝國の研究》，頁 87-128。

<sup>4</sup> 藤原隼一，《デモクラシーの帝国》（東京：岩波書店，2002）等。

<sup>5</sup> 麥可·哈德 (Michael Hardt)、安東尼奧·納格利 (Antonio Negri) 著，韋本、李尚遠譯，《帝國》（臺北：商周出版社，2002），頁 44。

向的方式展開新帝國史研究，並與全球史的研究聯結在一起。<sup>6</sup> 這一「帝國轉向」也受到政治思想史學者的關注。他們在國際視野中，探究諸如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等政治理論家與「帝國」，及「帝國」與自由主義等政治思想的關聯。<sup>7</sup> 進而，政治思想史也發生「國際轉向」，在國際視野中，探究國際法、主權等思想觀念在全球空間的翻譯、流傳，及其如何在不同脈絡中被理解，如何與不同在地經驗的交流、碰撞等問題。<sup>8</sup>

本文共有上述思想史的「國際轉向」這樣的問題意識。然而，現今關於國際思想史研究主要都是在歐洲語言（特別是英語）語境中展開，討論近代歐洲源起的觀念等等。我們思考本文的核心概念「帝國」如何在東亞漢文圈中被翻譯與流傳時，必須注意到東亞知識人對於「帝國」的想像與理解，除受不同理論，及 Imperium、Empire、Reich 等歐洲語言影響外，也受到「帝國」這一漢字詞彙修辭語法，及東亞諸國各自歷史文化的影響。其不同脈絡，具不同意義。所以，我們要如何東亞已有的文化、語言脈絡中，思考、討論「帝國」的問題呢？

首先，「帝國」畢竟不若「天下」等語詞，非漢文中既有常用，而是外來的翻譯語彙、概念，故過去的中國皇朝就何種意義可稱為「帝國」是一個問題。新清史學者也帶著從上述「帝國轉向」而來的問題意識，從帶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意義的「帝國」概念來理解前近代的中國（特別是向西方陸地擴張的大清帝國），但遭受許多當代中國學者的批評。<sup>9</sup>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對之有所回應——他指出近代中國學術著作興起以「帝國」指稱二十世紀前中國的熱潮，但卻傾向於否定傳

---

<sup>6</sup> 參閱 Durba Ghosh,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3 (2012): 772-793; 平田雅博，〈帝國論の形成と展開：文化と思想の観点から〉，《社会経済史学》80.4 (2015): 21-36。

<sup>7</sup> Jennifer Pitts, "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2010): 214-218. 在這個問題上，中研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史研究專題中心「帝國與文明」主題計畫曾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舉辦過「帝國與國際政治思想：從格勞秀斯到馬克思」國際研討會。該會議論文集尚待出版，但其中的陳正國論文已在期刊上發表，〈亞當史密斯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2 (2020): 131-197。

<sup>8</sup> 大衛·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著，胡全威譯，〈思想史的國際轉向〉，《思想史》1 (2013): 213-241。

<sup>9</sup> 李愛勇，〈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朱政惠、崔丕編，《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頁196-204；歐立德 (Mark C. Elliott)，〈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探索與爭鳴》2018.6: 54-55。又，汪暉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中也對「清帝國主義」這一說法持批評態度（上卷第1部，頁14-23）。

統中國具帝國主義性質。同時，他指出歐洲人約在清朝成立後的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稱中國為「帝國」，認為這是因為清朝乃是由滿人、漢人等許多不同民族所組成的政體，及滿人的征服行動等喚醒了歐洲人自身對於羅馬帝國的歷史記憶及「帝國」的歷史觀念，從而將之加諸中國。然後在一個漫長演變過程之後，清末中國人才開始自稱「帝國」。<sup>10</sup>

所以，歐立德等人在「帝國轉向」的全球史視野中，將清朝視為一種「帝國」，並展開比較帝國史的討論。這裏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所謂「大清帝國」可否以上述近代意義的「帝國」概念來解釋？第二，中國是何時開始他稱和自稱為「帝國」的？對於第一個問題，筆者以為若從新帝國史角度，或將「帝國主義」單純理解為一種領土擴張主義，不管其理由為何，對於有領土擴張行為的傳統帝國體制也可理解為一種帝國主義國家。就這個角度來說，清朝對外的擴張也可從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不過，就馬克思主義的史學觀點來說，如後述，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解必須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連動來看，故持此一立場的學者們自然會抵抗從帝國主義角度來解釋受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侵略的中國歷史。

其次，就第二點，曹新宇和黃興濤已撰文論述在清朝之前，歐洲已將中國稱為「帝國」(Imperium, Imperio)。<sup>11</sup> 這主要是從歐洲史內部來提出不同的觀點。相較之，本文主張清朝官僚、知識人開始大量以「帝國」自稱，應與日本有關。即本文認為關於中國在接受「帝國」一詞時，同為漢文圈之日本的媒介意義有再討論的必要。所以，本文企圖從歐語圈<sup>12</sup> 到漢文圈、漢文脈，<sup>13</sup> 及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的

<sup>10</sup> 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1：29-40。

<sup>11</sup>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15.5：52-63。

<sup>12</sup> 關於「歐語圈」這個術語，感謝一位審查委員提供「歐語世界」這一想法，然考慮到與「漢文圈」的對應關係，故使用「歐語圈」。即指主要受拉丁文脈（這一點及其他本文方法論的思考，感謝蔡孟翰對拙文草稿提供的相關批評與指教）影響的歐洲語言世界。

<sup>13</sup> 本文中所謂的「漢文脈」是日文中的漢字語詞概念，是從日本角度建構的概念。齋藤希史教授在《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學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5）、《漢文脈と近代日本》（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7）中，論述在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的清末中國與明治日本間，不論在言語表現或出版、讀書方法等皆有密切關係，構成一個「文學圈」（傳統漢學定義中的「文學」），而「漢文脈」便是構築該「文學圈」的核心概念。所謂「漢文」指中文學術語境中的「文言文」，其所謂的「漢文脈」不只是指文言文（「漢文」）相關的書寫體系、語詞與文法，亦包括漢文所含有的思考樣式、感覺等。又，「漢文圈」可理解為由「漢文脈」所聯結的空間，大抵指涉東亞。

近代日語除日語本有的語詞和文法（和文脈）之外，因在過去日語的形成過程中，大量翻譯漢文語詞和文章，故受漢文影響，存在漢文脈，同時近代日語也大量翻譯歐洲語文，故也發

脈絡來解釋上述問題。在這一問題意識的延伸下，從一種跨境、跨文脈的政治概念的思想史、翻譯史角度來說，我們關心如下的問題。

首先，在歐語圈中與「帝國」相關的 *Imperium* 等概念語群的意義是如何演變的？在東亞漢文圈中，原本漢文脈中之「帝國」這一漢字詞彙所指為何？共有漢文脈的日本對「帝國」的理解與翻譯是否直接影響了清末中國對「帝國」和「帝國主義」等詞的理解與使用？

在當代世界，我們習慣從英語的 *Empire* 如何對譯為中文的「帝國」這種國與國的語言翻譯角度來思考問題。<sup>14</sup> 然而歐洲語言中表達「帝國」的詞彙，除英文的

---

展出受歐洲語言文法影響的歐文脈（洋文脈）。另外，漢文（「文」）可用漢語、日語、韓語、越語等語言來閱讀乃至翻譯。這些語言共同受「文」之影響，但各自是不同的語言（「言」），且其各自社會、文化的脈絡也不同。本文中使用「和文脈」概念乃就「言」這一層次而言，指涉日語本有的語詞和文法等。日語本混入源於文言文的漢字語詞和文法、文化的影響。如日語中「帝」的漢字音有「てい」（漢音）或「たい」（吳音），從而具漢字「帝」之意，但也可訓讀為日語本有的「みかど」。「帝（みかど, mikado）」即是純粹的「和文脈」的語音與語詞，但其做為「帝」的譯詞時，也增加了「帝」的意涵。即漢字漢文（文言文）會影響日語，日語也會影響日本漢文。所以，日本漢文不能單純還原為中國的古典文言文來理解。在相關研究方面，Peter Francis Kornicki 從全球視野，受 Sheldon Pollock 所提出的 *cosmopolitan language* 和 *vernaculars* 關係的討論啟發，以 Sinitic (literary Chinese) 對 *vernaculars* 的方式，解釋漢文圈（東亞）中，文言文與漢語（包括白話文和各種方言、方言書寫文體）和中國外部的語言、書寫文體（日語、韓語……）等的關係。Kornicki 特別強調 Sinitic 與 Latin 不同，無口說語言部分，故只能以漢語中的各種時代口音、各種方言口音和日語音、韓語音等去發音閱讀，見 Peter Francis Kornicki, *Languages, Scripts, and Chinese Texts in East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正是這樣，漢文（文言文）與和文的關係非能簡單還原為做為一種國語的漢語和日語，文言文並非只能用漢語聲音來讀。所以，本文不是從國對國的語言翻譯，即不是漢語與某西方國家語言或日語與某西方國家語言間的語言翻譯角度來進行討論的；而是從東亞國家共有的漢文（文言文）書寫傳統與歐洲語言間之語詞翻譯與挪用論起，再論及「漢文脈」與「和文脈」間相互影響的問題。筆者認為如此的方法論當能更有效地從思想史觀點討論重要政治概念在東亞的翻譯與流傳的問題。

<sup>14</sup> 劉禾 (Lydia H. Liu) 在《跨語際的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杰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中，便主要是從語言觀點討論本源語 (source language) 和譯體語 (target language) 的語際相互作用問題。該研究主要討論英語與漢語（中文）間的翻譯與中國現代性生成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我們理解西方概念的翻譯與現代中國文學、思想的關聯。雖然劉禾也強調日語漢字譯法在中國接受新名詞的媒介意義，然其研究主要是在「言」（聲音語言）層次展開，並未能深入討論「言」與「文」（文言文）之差異，及「文」在前近代東亞思想文化之擴張與影響，還有「文」在東亞漢文圈國家譯介近代西方思想史時的媒介作用等問題。而且，若將視野擴張到日本，則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日

Empire 外，尚有 Imperium（拉丁語）、Empire（法文）、Kaiserreich（Kaisertum 或 Reich，德語）、Keizerrijk（荷蘭語，現代語拼法為 Keijzerrijk）等等。這些語詞在歐洲諸多語言之間的翻譯過程中本就產生許多複雜意思，且受到歐洲歷史本身發展的影響。這些在歷史上形成的語意對「帝國」這一漢字詞彙的形成和運用皆具重要影響，故不能只從 Empire 如何對譯「帝國」的角度來理解問題。共有「漢文」（文言文）這一傳統知識遺產的東亞國家也共同面對來自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與概念衝擊，故應關注日本對「帝國」的理解與翻譯是否直接影響了清末中國對「帝國」和「帝國主義」等詞的理解與使用這一問題。

就漢文脈中的「帝國」一詞而言，陳力衛已指出：「中國古典中的『帝國』尚不是一個結合緊密的複合詞，意義也和現在不同。」<sup>15</sup> 中國官僚以 Empire 譯語之意的「帝國」來稱中國的情況當始於清朝晚期。黃興濤就認為「帝國」一詞是由留學東京的學生在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末帶回中國的。<sup>16</sup> 但也如歐立德所論，英語 Empire 翻譯為漢語「帝國」的情況似乎是，在一八二〇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這個報刊連載的世界地理書《全地萬國紀略》(*Sketch of the World*) 中開始的。<sup>17</sup> 該書以非洲為例，解釋了世界上各國家層次結構，曰：「亞非利加之分，有侯國、有王國、有帝國，又有多小國未有一定的朝政者。」<sup>18</sup> 然而，這似乎是個比較孤立的情況。本文認為「帝國」一詞在中國的流行，乃至以「帝國」來指涉「大清國」，當是在清朝政府和知識人透過與日本共有的漢文脈，在與日本的互動過程中習得、普及的。

若然，如上述，我們的另一個問題是，「帝國」一詞如何在日本被發明出來？關於這一問題，本文擬在相關研究基礎上，<sup>19</sup> 探究「帝國」這一漢字語詞在德川後

---

本人在翻譯西方概念時，不只是從英語，也有許多是從荷蘭語、德語、法語翻譯過來的新概念的問題。

<sup>15</sup> 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3：367。

<sup>16</sup> 黃興濤，《文化史的視野：黃興濤學術自選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頁 69。

<sup>17</sup> 歐立德在〈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一文中認為，該書是首位來中國傳教的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所撰寫的（頁 36）。但該連載文當是由原本被派去協助馬禮遜的傳教士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 所編寫的，見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7。

<sup>18</sup> 轉引自歐立德，〈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頁 36。

<sup>19</sup> 關於日語中的「帝國」一詞，吉村忠典在〈帝国という概念について〉（《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 39-76；原出於《史學雜誌》108[1999]）中已網羅各種相關史料。他一方面指出當代日語中使用的「帝國」一詞的對譯語 Empire 源自指涉「羅

期的日本被蘭學者、英學者作為 Keijzerrijk 和 Empire 的譯語使用後，如何被儒者和國學者理解、使用的問題。為探究此問題，本文擬討論會澤正志齋 (1781-1863) 的《新論》、國學者大國隆正 (1793-1871) 的《本學舉要》和竹尾正胤 (1833-1874) 的《大帝國論》等文本，分析他們是如何理解、使用「帝國」這一漢字語詞，並如何展開其對世界秩序的認識。然後，筆者會就《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編纂過程，探究「帝國」概念如何在明治時期被使用，並傳至中國的過程。進而比較同為漢文圈的明治日本與清末中國之使用狀況的異同。藉此，本文將在全球政治思想史的視野中，強調東亞漢文圈中的國家在接受西方政治概念時，除需考量漢文脈本身所具有

---

馬帝國」的 Imperium，意指羅馬政權的命令權所及的區域，不同於日耳曼語系的荷蘭語 Keijzerrijk（意指皇帝之國）等語詞，與其統治者是否為皇帝無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文的「帝國」不是源於中國的古文，而是一個「和製漢語」。首先，蘭學者創造出「帝爵之國」及其略稱「帝國」，之後以之翻譯屬日耳曼語系的荷蘭語 Keijzerrijk，其後才成為 Empire 之譯語，最後才傳入中國。其次，前野みち子在〈国号に見る「日本」の自己意識〉（《言語文化研究叢書》5[2006]），從國號的角度論及「帝國」一詞在江戶日本的創制與使用，並論及幕府內部的「帝國王國優劣之論」和近世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稱呼等問題。再者，桐原健真在〈『帝国』の誕生〉（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帝国』の思想〉（吉田忠編，《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秩序観の比較研究》〔京都：財団法人国際高等研究所，2010〕）、〈「帝国」言説と幕末日本：蘭学・儒学・水戸学そして幕末尊撰論〉（明治維新史学会編，《明治維新と思想・社会》〔收入《講座明治維新》10，東京：有志舎，2016〕）等文中，則以蘭學者、儒者及國學者的資料論述「帝國」這個和製漢語詞如何在幕末日本被使用的情況。他在這些論文中，討論幕末知識人如何在對東亞漢文圈既有的冊封體制秩序和近代西方主權國家秩序的混淆過程中，發明、使用「帝國」這個語詞，主張許多幕末日本知識人認為日本是「帝國」，且「帝國」這個稱號是由西洋這個他者給予的，具客觀性與普遍性，故促使他們確認日本是一個能與西洋列強比肩的優越獨立國家形象。另外，在中文論文方面，藍弘岳在〈「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22.3[2011]）中對於江戶時代蘭學者與會澤的「帝國」論述也有所討論，但未論及明治與清末中國的「帝國」概念如何被使用的問題。相較於這些先行研究主要在日本史或日本思想史，並從日歐對比的觀點展開討論；本文除了將繼承這些相關研究成果之外，並要在其基礎上，從全球史與東亞漢文圈的視野中，找出更多的史料，更仔細地討論蘭學、儒學和國學的相關思想史文本，然後在此基礎上探究幕末和明治日本的「帝國」語詞如何受和文脈影響的情況，及該漢字語詞又如何在漢文脈中從幕末日本傳到清末中國的過程。最後，在本文通過審查後，經由渡邊浩教授的介紹，得知桐原健真又寫下〈なぜ日本は「帝国」なのか：幕末日本を出発点に〉（楊際開、伊藤貴之編，《「明治日本と革命中国」の思想史：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相互還流》〔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21〕，頁19-35）。該文在文末也簡單論及「帝國」一詞從日本傳到朝鮮王朝、清末中國的問題。酌請參考。

的媒介意義外，更要深入各自的社會、國家之歷史文化與語言脈絡的差異，從而理解「帝國」這一源於西方政治論述的概念如何在東亞漢文圈中展開的過程與其思想史意義。

## 二・歐語圈中的「帝國」略論

### (一) Imperium

為了討論「帝國」在東亞漢文圈如何被翻譯、使用的問題，先據既有研究，論述歐洲語言中之「帝國」相關語意的源流與發展。首先，在歐洲語言中表達「帝國」的詞彙多源自拉丁語 *Imperium*，可解作「治權、最高權力」或「命令權」。*Imperium* 的詞根來自動詞 *imperare*，意即「指揮、命令」。*Imperium* 是羅馬官員的至高權力，包括軍事指揮權、解釋和貫徹法律的權力等。但 *Imperium* 後來衍生出地域空間的內涵，所反映的是 *Imperium* 在不同地理範圍內的實踐，即 *Imperium* 行使的空間即為羅馬帝國。重要的是，做為空間概念的 *Imperium* 中的權力行使者不只是後來羅馬帝制中的皇帝、官員，也包括羅馬人民。羅馬之所以是 *Imperium*，不是因其統治者是皇帝，而是指羅馬政權的命令權所及的區域，包括本來在其外部的諸國家、地區。<sup>20</sup> 所以，共和時期的羅馬也可稱為「羅馬帝國」(*Imperium Romanum*)。

再者，*Imperium* 成為 *Empire* 的語源，而有 *Imperium* 這種權力並能向外征戰的就被稱為 *Imperator*，後世歐洲語言中用來指「君主」之稱號 *Emperor* 就是源於此語。在羅馬帝國之後的歐洲歷史中，因為象徵、譬喻等修辭方法的影響，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等許多國家因其統治者有如 *Emperor* 等，都被稱為 *Empire*。<sup>21</sup>

其次，從歷史的展開過程來說，隨著在四世紀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後，帝國與基督教這種世界宗教和一神教的觀念結合，羅馬帝國便成為基督教帝國 (*Imperium Christianum*)，更強化羅馬帝國的普世主義傾向，創造了某種新的羅馬基督教一神論式的普世主義帝國，及世界帝國的理念。<sup>22</sup> 這一帝國有三個繼承者，即

<sup>20</sup> 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53-55；王悅，〈由治權到帝國——從拉丁文“帝國”概念的衍生看羅馬人的帝國觀〉，《古代文明》10.2 (2016)：14-17。

<sup>21</sup> 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56-58。

<sup>22</sup>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London: Pimlico, 2003), pp. 9-10；ハンス・クルト・シュルツェ (Hans Kurt Schulze) 著，五十嵐修，淺野啓子等譯，《西歐中世史事典 II：皇帝と帝国》（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5），頁 96-99。



拜占庭帝國、伊斯蘭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我們在此並無暇去討論這三個帝國、宗教文明圈與基督教羅馬帝國間的關係，但從世界史的發展過程來說，拜占庭帝國，其後的俄羅斯帝國，及伊斯蘭世界中之阿拔斯帝國 (Abbasid Caliphate) 和伍麥亞帝國 (Umayyad Caliphate) 乃至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皆或多或少與基督教羅馬帝國有關。<sup>23</sup>

## (二) Reich、Kaiserreich

但就「帝國」(Imperium、Empire) 的概念發展來說，更重要的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中神聖羅馬帝國的出現，之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帝位與法蘭克王國連結在一起。<sup>24</sup> 十世紀中期，東法蘭克國王鄂圖一世 (Otto I, 912-973) 在羅馬由教宗約翰十二世 (Pope John XII, 930/937-964) 加冕為帝，正式建立神聖羅馬帝國，成為羅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統治者。之後，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除了是德意志人的國王之外，也是基督教的保護者，體現歐洲的普世性秩序。<sup>25</sup>

神聖羅馬帝國的拉丁語是 *Sacrum Romanum Imperium*，德語則是 *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但其實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權力是脆弱的，在十五世紀，帝位已皆由哈布斯堡家族繼承時，教宗就不再加冕其為皇帝，帝國改稱為「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皇帝稱號為 *Erwählter römischer Kaiser*。他的合法性完全來自於選侯的選舉。此時，儘管帝國與皇帝依然存在，卻早已有名無實。特別是在西發里亞條約簽訂後，帝國變成只是由許多主權國家群所組成的鬆散政治聯盟。*Reich* 本身意謂某君主統治的範圍，雖可翻為「帝國」，但 *Reich* 的元首也不一定擁有皇帝的頭銜，故也可只翻為「國」。如神聖羅馬帝國本身是 *Kaiserreich*，波蘭、普魯士等則是王國 (*Königreich*) 等。在神聖羅馬帝國倒台之後，*Reich* 的理念仍持續影響德國乃至歐洲歷史。如在德意志帝國 (德意志第二帝國，*Deutsches Kaiserreich*) 成立時，*Reich* 的理念是保障君主制聯邦制度中之普魯士主導權的手段，意謂「上帝庇護的皇帝之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

---

<sup>23</sup> Lieven, *Empire*, pp. 10-13.

<sup>24</sup> ハンス・クルト・シュルツェ，《西欧中世史事典 II》，頁 21-24。

<sup>25</sup> 石田勇治，〈帝国の幻影—神聖ローマ帝国からナチズムへ—〉，山内昌之編，《帝国とは何か》（東京：岩波書店，1994），頁 183。

國家。同時在德意志帝國中，Kaiserreich 之下包含數個 Königreiche（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符騰堡等等）。<sup>26</sup>

### （三）Empire、Imperialism

如前述，Empire 的語源可追溯至 Imperium，但在文藝復興後，隨著主權國家的登場，及新大陸的發現，「帝國」(Empire) 一詞被用來暗示在其上無上位權威存在的主權國家獨立性。<sup>27</sup> 在這意義上，「王國」也可以是「帝國」。故十六世紀前期，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 主張：“This realm of England is an Empire”。<sup>28</sup> 其後，隨「大英帝國」的歷史發展，《1603 年聯合法案》通過後出版的書籍中，Empire 已具指涉包括蘇格蘭王國、英格蘭王國、愛爾蘭王國及其他殖民地在內的統合國家 (Great Britain) 之意義。<sup>29</sup> 然後，到了十九世紀中期，Empire 更具體指涉一個包括母國與其諸多殖民地間混雜的體系。<sup>30</sup> 正是在這個「帝國」體系上，「大英帝國」有意識地展開 Imperialism。因此，雖然亞當史密斯（或譯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已於十八世紀在《國富論》（或譯《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中展開其「帝國」論述，追尋「正義的帝國」形象與討論相關政策，然其「帝國」論自然不同於十九世紀中期後大英帝國有意識地展開 Imperialism。<sup>31</sup>

歐語圈中表述帝國主義的 Impérialisme 和 Imperialism 的語意變化也是重要的思想史問題，影響到後來我們對「帝國」(Empire) 的理解。首先，十九世紀四〇、五〇年代的法國和英國先後出現 Impérialisme 和 Imperialism 兩個語詞，用來批判欲恢復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榮光並以此合理化自己統治的拿破崙三世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 與其政治野心，及其所建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的

---

<sup>26</sup> 石田勇治，〈帝国の幻影〉，頁 182。又，本文於關於 Reich 與德國歷史關係的理解，受教於陳致宏教授。在此特別致謝。

<sup>27</sup> 木村俊道，〈帝国〉，古賀敬太編，《政治概念の歴史的展開》第 4 卷（京都：晃洋書房，2011），頁 133。

<sup>28</sup> G. R. Elton, *Tudor Constitution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53. 轉引自木村俊道，〈帝国〉，頁 134, 147。

<sup>29</sup> 木村俊道，〈帝国〉，頁 135-136。

<sup>30</sup> Richard Koebner and Helmut Dan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50-80.

<sup>31</sup> 陳正國，〈亞當史密斯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頁 131-197。

對外擴張政策。<sup>32</sup> 雖然英語中的 Imperialism 本也是用來指稱拿破崙三世的政治，但在一八七二年，當時英國保守黨首相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在著名的水晶宮演講中用 Imperialism 來說明其對外擴張政策，以提升英國國王威信。後來在普法戰爭結束以及隨之而來的法蘭西第二帝國 (Second Empire Français) 結束、還有德意志帝國 (Deutsches Kaiserreich) 成立的背景下，意圖以該語詞來凸顯大英帝國 (British Empire) 的全球統治地位。此時，「帝國主義」(Imperialism) 一詞主要指支持向外擴張以追求國家榮光的一種政策主張及其政治領導力。<sup>33</sup> 到了十九世紀九〇年代的歐語圈中，不只統治階層，就連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且不管是贊成或反對殖民地擴張政策之人，都開始使用該詞彙，並有許多人自稱為帝國主義者。<sup>34</sup>

相較於上述從政治觀點展開的帝國主義論，也是在十九世紀末，經濟意涵開始被注入 Imperialism 這語詞中。一九〇二年，霍布森 (John Atkinson Hobson, 1858-1940) 出版了《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m: A Study*) 一書。<sup>35</sup> 他在歐洲列強分割非洲的國際背景下展開其論，主要從政策面討論帝國主義。他在該書的〈一九三八年版序文〉中指出金融業者主張獲得殖民地以擴張投資機會，強調金融資本投機性投資是帝國主義擴張的原因。<sup>36</sup>

有意思的是，霍布森指出：「多數互相競爭的帝國這種觀念本質上是近代的。古代及中世世界之『帝國』的根本觀念是，在一個統治權下諸國家聯合這樣的觀念」，<sup>37</sup> 並從諸帝國在非洲乃至亞洲的殖民地爭奪戰來討論「帝國主義」。其論區別出上述傳統體制的帝國，指出近代的「帝國」是，一種彼此主權平等且競爭的國家，同時也是帝國主義國家。此外，在該書下卷，霍布森也從政治觀點，批評這些金融業者以愛國主義為其保護色，及批評英國人以文明化使命等理由來合理化其向外擴張和殖民的行為。即其帝國主義論雖主要從經濟觀點解釋之，但也顧及政治化的面向。<sup>38</sup>

<sup>32</sup> Koebner and Schmidt, *Imperialism*, pp. 1-26.

<sup>33</sup> Koebner and Schmidt, *Imperialism*, pp. 107-134.

<sup>34</sup> Koebner and Schmidt, *Imperialism*, pp. 196-220. 還有スティーヴン・ハウ (Stephen Howe) 著，見市雅俊譯，《帝國》(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 33-34 等。

<sup>35</sup> 參閱日譯本，ホブソン (John Atkinson Hobson) 著，矢内原忠雄譯，《帝國主義論》上卷 (東京：岩波書店，1951)。

<sup>36</sup> ホブソン，《帝國主義論》上卷，頁 12。

<sup>37</sup> ホブソン，《帝國主義論》上卷，頁 47。

<sup>38</sup> ホブソン (John Atkinson Hobson) 著，矢内原忠雄譯，《帝國主義論》下卷 (東京：岩波書店，1952)，頁 7-53。

相隔十多年後，在霍布森《帝國主義論》的基礎上，列寧 (Vladimir Lenin, 1870-1924) 也為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寫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簡稱《帝國主義論》，1917) 一書。<sup>39</sup> 列寧在該書最後一章中，將「帝國主義」總結說明為「獨占資本主義」的形成階段，說明「獨占」即是生產蓄積到非常高度的發展階段，導致金融寡頭制的出現，及列強在世界分割殖民地的狀況。<sup>40</sup> 但「帝國主義」也是從資本主義制度前進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階段，是「普羅階級之社會革命前夜」。<sup>41</sup> 所以，列寧強調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帝國主義的競爭，致使社會主義革命終將成功，進一步在一種目的論的世界史視野上來定義、理解帝國主義國家。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乃至後殖民的理論中，「帝國主義」得到相當多的討論，且已轉變成相當負面的概念。

另一方面，熊彼得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在一九一九年發表〈諸帝國主義的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從社會學角度解釋「帝國主義」。<sup>42</sup> 他反對如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從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來理解帝國主義，而是將之視為國家無目的地、無底限地進行暴力擴張的一種傾向、非理性的行動。故他認為那不屬於特定歷史階段和特定階級，而是在各個時代，許多社會和國家皆會發生，特別在古代社會以其最純粹的形態顯現。<sup>43</sup>

實際上，關於帝國主義的定義與論述各式各樣都有，然大抵可大分為經濟觀點和非經濟觀點的解釋。如明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1951-) 所指出的，「按照帝國主義研究理論的看法，大帝國的產生僅僅起因於志在擴張的精英層的作用。對聲望的需求、對增強勢力的追求以及對更大利潤的貪念，使一些大國在經濟上採取對其他地區滲透、在政治上採取吞併的政策，歐洲的各個殖民帝國的產生就是這種政策的結果」。<sup>44</sup> 據我們前面也討論過的文本等，他認為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也可大分

---

<sup>39</sup> 參閱日譯本，レーニン(Vladimir Lenin) 著，副島種典譯，《帝國主義論》(收入《国民文庫》103，東京：大月書店，1952)。

<sup>40</sup> レーニン，《帝國主義論》，頁 159-161。

<sup>41</sup> レーニン，《帝國主義論》，頁 17。

<sup>42</sup> 該論文收在英文版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lated by Heinz Norde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ul M. Sweez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1)，都留重人再據英文版翻為日文書《帝國主義と社会階級》(東京：岩波書店，1956)。

<sup>43</sup> 靜田均，〈シュンペーター帝國主義論序説〉，《經濟論叢》80.4 (1957)：398-413。

<sup>44</sup> 明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著，孟翰、閻振江譯，《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頁 18。

為經濟學與政治學兩種帝國主義研究理論。經濟學帝國主義理論，大抵強調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危機相關的問題。相較之，政治學帝國主義理論則認為國家是為了權力和影響而展開競爭，強調對威信的追求和非理性的動機。<sup>45</sup> 在二十世紀，特別是經濟觀點的帝國主義論一直是解釋近代「帝國」問題的重點。所以，在上述這些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等學術領域中，除了前述的大英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等歐洲國家外，日本帝國也被理解為實行「帝國主義」的「帝國」。後來，所謂「正式帝國」與「非正式帝國」等等之論，大都是帝國主義研究的一種延伸。<sup>46</sup>

總而言之，相對於 *Kaiserreich* (*Keijzerrijk*) 指有皇帝的帝國，*Imperium* 和 *Empire* 乃至 *Reich* 則不一定指有皇帝的帝國、國家。又，在十九世紀建構的近代國際法體制中，不管是 *Deutsches Kaiserreich*（德意志帝國）或 *British Empire*（大英帝國）都是主權對等的國家，同時也擴張為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帝國」。

下面我們將在上述對歐洲語言中之「帝國」與「帝國主義」的理解基礎上，來探索「帝國」這個概念到底是如何進入並在東亞漢文圈中發展的。

### 三・漢文脈中的「帝國」：「帝」與「國」、「天下」

若就「帝」與「國」之各別字義來說，據池田末利的研究，「帝」（或「上帝」）這個字在卜辭中已具有降福、降咎之主宰者的意思，<sup>47</sup> 在周代之後該詞相當於「天」之至上神、主宰雨風等自然現象外，也主司降難、降禍等。<sup>48</sup> 此外，也正是在周代之後，「帝」被理解為配天祭祀的始祖神外，從如「帝嚳」、「帝堯」、「帝舜」（《史記》）這些說法可知傳說中的上古聖王也被稱為「帝」，也有如秦昭王因其權威超越其他王而稱「西帝」<sup>49</sup> 這種現世君王稱「帝」的例子。<sup>50</sup> 所以，在戰國之前，「帝」當具相當於「天」乃至上古聖王，及其權威超越其他現世君王的統治者之意。相對之，出土周代銘文中既有「宅茲中國」這個語詞，其中的「國」被認為指成周（洛邑）這個都城及其周邊地區。<sup>51</sup> 「國」的本義「可能是有界之地

<sup>45</sup> 明克勒，《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頁 18-33。

<sup>46</sup> 竹內幸雄，〈帝國主義・帝國論争の百年史〉，《社会経済史学》80.4 (2015)：3-20。

<sup>47</sup> 池田末利，《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1981），頁 240。

<sup>48</sup> 池田末利，《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頁 219。

<sup>49</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五，〈秦本紀第五〉，頁 267。

<sup>50</sup>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頁 55-56。

<sup>51</sup>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7.3 (2009)：177。

域，後來擴大為四面有牆、周圍有一定之土地相連（郊）的城（邑）」，之後延伸其意，指一種「多城政治體」。<sup>52</sup> 概括言之，「國」原本的字義是周代時在中原地域的都城乃至一種都市國家。

在諸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等文句中，我們可看到「天之下」與「王」結合的例子。<sup>53</sup> 然在後來中國歷史的發展中，「帝」也開始與「天下」結合使用。在《漢書》中可見「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sup>54</sup> 將「皇帝」與「天下」連結，並提出「天下」為天命所歸之一姓私有的家天下思想。<sup>55</sup> 眾所周知，「皇帝」稱號源於秦始皇。其之所以獲得「皇帝」的稱號，乃因其「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的功績。<sup>56</sup> 皇帝統治的範圍是「天下」。此後，中國歷史皇權皆然，將其統治的範圍認知為「天下」。據西嶋定生的研究，「皇帝」中的「皇」雖取自上古神話中「泰皇」之「皇」，但與「帝」連用時，具形容詞功能，所謂「皇帝」指「煌煌上帝」之意，故秦始皇據之捨棄「天子」、「王」等稱號，以將自己和「上帝」同一化。在這一意義下，皇帝本身就是天下的主宰者、權威的根源。然漢代以後，雖最高權力統治者也援用「皇帝」稱號，不過因受儒家思想影響，「皇帝」統治天下，已等同於「天子」，受「天」之制約。其次，周代封建制度思想也再度被運用於郡縣制度中，從「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稱帝王，明以號令臣下」（《孝經鈎命決》）的思想中，「皇帝」之爵位為「天子」，使漢代爵位制度和天之秩序相連結。<sup>57</sup> 後來，諸如「天子」（帝）→王→侯的身分秩序思想也應會在創制「帝國」一詞時發生一定的影響。

如上述，皇帝統治的範圍是天下，然而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所統治的天下其實已不同於先秦文獻中的天下觀和周王（周天子）所實際統治的天下。大抵而言，相較於秦漢以後郡縣制中國的天下也具「國」（帝國）這層次的意義，周代的天下必須與封建制度和以周天子為核心的祭祀共同體等聯合來理解，更傾向於指涉一種

<sup>52</sup> 張其賢，〈「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頁 178-179。

<sup>53</sup> 阮元校勘，《詩經》（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小雅·谷風之什·北山〉，頁 444。關於「天之下」與「王」結合使用的問題，感謝編委會委員指正。

<sup>54</sup>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九三，〈佞幸傳第六十三 董賢〉，頁 3738。

<sup>55</sup> 邢義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14-15。

<sup>56</sup>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本紀第六〉，頁 304。

<sup>57</sup>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頁 52-78。

國際秩序。<sup>58</sup> 關於這點，王夫之（1619-1692）有清楚的解釋，他說：「不察古之天下為封建，故國必先治，今之天下為郡縣，故不須直隸于司道，固難以今之天下統為一國者為古之天下釋。」<sup>59</sup>

重點是如此一來，「天下」被攝入於皇帝所統治的國家之中，中國皇朝最高統治者也成為具普世性世界政治秩序架構的天下國家唯一合法統治者，一方面受「天命」制約，一方面也以「天命」來主張其統治正當性。後來非漢人外來政權也被這一「天下」與「天命」所組成的政治秩序思想吸引，並以這一政治秩序思想詮釋其政治地位。<sup>60</sup> 這一意義的「天下」就其在統治空間的寬廣性、內部的多元性等，實與上述 Imperium (Empire) 有類似之處。大概也因為如此，Empire 才會在清朝的《英漢字典》中被翻為「天下」（後述）。不過在中國傳統政治秩序觀，相較於「天下」是具重要意義的政治概念，「帝國」並不是。

事實上，就中國歷史語境而言，「帝國」這種言語表述方式極少出現，「帝天下」這種「帝」與「天下」合用的情況反而比較多。在《全唐文》中，更可找到許多「帝天下」的用法，如下：

- (1) 昔有虞之帝天下也，契作司徒，誕敷邦教，五常以遜，百姓斯親。<sup>61</sup>
- (2) 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sup>62</sup>
- (3) 昔吾君夏后氏之子，霸有幽都，皇運北興，鼎圖南起，開寶符而帝天下，撫璿璣而王中國。<sup>63</sup>

<sup>58</sup> 討論天下秩序、天下觀的論文相當多，畢竟「天下」的問題相當複雜，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理解，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詳論。本文的理解主要參閱邢義田，《天下一家》，頁1-135；甘懷真，〈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祭禮改革為中心〉，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93-148；蔡孟翰，〈論天下：先秦關於“天下”的想像與論述〉，《文化縱橫》2017.4，等等。其中，諸如先秦時期的天下所表述的國際秩序是否可理解為蔡文所主張的「融合『國』的政治體」等問題皆是相當值得討論的問題。

<sup>59</sup>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42。

<sup>60</sup> 類似問題的討論參閱趙汀陽，《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頁54-134。

<sup>61</sup> 唐德宗，〈冊馬燧司徒文〉，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五四，頁586。

<sup>62</sup> 陳子昂，〈諫雅州討生羌書〉，董誥等，《全唐文》卷二一二，頁2149。

<sup>63</sup> 陳子昂，〈唐陳州宛邱縣令高府君夫人河南宇文氏墓誌〉，董誥等，《全唐文》卷二一六，頁2183。

- (4) 是以漢祖之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其則，然後能戡定秦項而帝天下。<sup>64</sup>
- (5)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sup>65</sup>
- (6) 堯帝天下七十載。<sup>66</sup>
- (7) 平蕭銑輔公祐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為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sup>67</sup>
- (8) 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sup>68</sup>

在這些例句中，「帝天下」之「帝」是當動詞使用的，具「稱帝統治」之意，並不是複合詞意義的「帝天下」。即「帝」和「天下」複合而成的名詞意義之「帝天下」其實幾不見之。「帝」做為「動詞」也可以跟「國」連接。在《漢書》中記載了一段有關南越王趙佗 (?-137 BC) 的傳記。其內容簡言之，趙佗本是漢朝皇帝冊封的南越王，但其對內自稱為「帝」，被發現後在寫給漢朝皇帝的信中，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sup>69</sup> 在這一句話中，已表明「帝」當是治天下者，比「王」的位階高。「帝其國」這個修辭用法後來也大抵指中國周邊國家之統治者（國王）自我稱帝統治的情況。

若把「帝」當動詞的話，除「帝其國」外，也可能出現「帝國」的用法。我們在《道德真經指歸》中可發現這樣的用法。其文為：「是以聖人不為有不為亡，不為死不為生，游於無有之際，處於死生之間，變化因應自然為常。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扶安天地，飾道養神，提挈萬物，帝國治民，解情釋意，俱反始真。」<sup>70</sup> 這裏的「帝」明顯是做為動詞使用的，但這樣的例子畢竟極少。

其次，若以「國」的原義來理解，以「城」的意義來使用的話，「帝」與「國」也可能以複合詞的方式連結使用，不過這樣的例句也不多。《全唐文》所收王勃 (649-676) 的〈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中有曰：「蔣山南望，長江北流。伍胥用而

<sup>64</sup> 賈至，〈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全唐文〉，董誥等，《全唐文》卷三六七，頁 3733。

<sup>65</sup> 李觀，〈漢受降城銘并序〉，董誥等，《全唐文》卷五三五，頁 5430。

<sup>66</sup> 陳鴻，〈大統紀序〉，董誥等，《全唐文》卷六一二，頁 6180。

<sup>67</sup> 呂溫，〈凌煙閣勳臣頌并序〉，董誥等，《全唐文》卷六二九，頁 6344。

<sup>68</sup> 白居易，〈對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董誥等，《全唐文》卷六六九，頁 6805。

<sup>69</sup> 班固，《漢書》卷九五，〈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頁 3851。參閱木村凌二、鶴間和幸，〈帝國と支配：古代の遺産〉，《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5》（東京：岩波書店，1998），頁 12-13。

<sup>70</sup>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收入《正統道藏》第 2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卷一一，頁 704。



三吳盛，孫權困而九州裂。遺墟舊壤，數萬里之皇城。虎踞龍盤，三百年之帝國。關連石塞，地實金陵。霸氣盡而江山空，皇風清而市朝改。昔時地險，實為建業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寧之小邑。……」<sup>71</sup> 在這文中，「帝國」與「皇城」並舉，明顯指涉「建業之雄都」、「江寧之小邑」，故我們可看到在古代中國文獻中「帝國」有可能用來指帝之都城。

好巧不巧，王勃之祖先王通 (583-617)<sup>72</sup> 在《文中子中說》（或稱《中說》）中有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sup>73</sup> 這段話中的「帝國」應是在三皇、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三王（禹、湯、周文王）、春秋霸主這種序列中之政治形態，指以「德」為其特色的五帝時代的國家。<sup>74</sup> 此文或與賈誼《新書》在討論匈奴問題時，所說的一文應有關。<sup>75</sup> 其文曰：「臣聞**伯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sup>76</sup>《中說》中的「帝國戰德」可能源於「帝者戰德」，之所以在《中說》中改為「帝國戰德」可能是受《新書》中「伯國戰智」之詞的影響與修辭的需要所致。<sup>77</sup> 若然，此書的「帝國」可能是個美麗的誤會。但不管如何，若我們按《中說》的脈絡來直接解釋上述引文，其義當是批判秦漢以後「天子戰兵」，故雖有「帝」之名，然其「帝制」已不若上古五帝以德治國之時，其「名」已不符「實」。<sup>78</sup> 又，其在「帝國戰德」之後再加上「皇國戰無為」則表現出其受老莊思想影響的一面。若我們配合《新書》中之思想，積極理解此文中之「帝國」，其意當可謂上古帝王以德治人的理想政治體，用以批判

<sup>71</sup> 王勃，〈江寧吳少府宅餞宴序〉，董誥等，《全唐文》卷一八二，頁1850。

<sup>72</sup>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九〇上，〈文苑上〉，頁5004。

<sup>73</sup> 王通著，阮逸註，深田厚齋點，《文中子中說》（大阪：文榮堂，1695），卷五，〈問易〉，頁9。

<sup>74</sup> 市川本太郎，〈隋の大儒文中子の思想〉，《國士館大学人文学会紀要》3 (1971)：205-206。

<sup>75</sup> 參閱 Penguinking, 〈帝國這個詞是舶來詞嗎？〉，知乎網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5302801/answer/292289907>，2018.01.10，讀取2020.09.24)。

<sup>76</sup> 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第四 匈奴〉，頁135。

<sup>77</sup> 鍾夏指出《文中子中說》「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或即賈誼所聞。又，「伯」通「霸」（賈誼，《新書》，頁141）。

<sup>78</sup> 「後之帝者非昔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王通，《文中子中說》卷五，〈問易〉，頁7）。

後世的「帝制」。但不論如何積極解釋之，都無法否定該詞是個孤例，未構成一種有效的政治概念。另外，我們在佛經中可見到「支多毘悉帝國」、「那摩帝國」等等的語詞，<sup>79</sup> 這當是以「帝」為譯音所翻譯出來的譯詞。

綜上所述，在傳統的漢文脈中，「帝」與「國」這兩者漢字原本的指涉範疇有異，應不容易結合在一起使用。其之所以會結合使用，主要有以「帝」為動詞，指「稱帝統治之國」的意思；另一種情況是「帝」與「國」皆是名詞的複合詞，但那是指帝之都城或上古帝王所統治之國家（但例子極少）的意思。最後，也有可能是以「帝」為譯音所譯出的。所以，做為 Empire 譯語的「帝國」顯然不是直接出自漢文經典的。總而言之，筆者以為「帝國」無疑是從日本的蘭學脈絡中首度被翻譯使用的。

#### 四・蘭學與「帝國」的翻譯

在日本的文獻中，「帝國」一詞首先出現在上述《中說》作者王通死後約一世紀編成的《日本書紀》中，其內容是關於佛教傳來日本的一段記錄：

冬十月，百濟聖明王更名聖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流通禮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辦無上菩提。……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sup>80</sup>

在這一段文字中，清楚記錄百濟王派遣其臣「怒唎斯致契」把佛像和佛經傳到日本。有意思的是，該文不使用日本，而使用了「帝國」這個語詞。但作者之所以選這個語詞，不知是否可能受漢文佛經的影響。按其脈絡，或其意為「帝（みかど）之國」。但此文中之「帝」的和語是「みかど」，而「みかど」本義是宮城中的門（かど），後具朝廷與天皇、國家等義，<sup>81</sup> 故「帝國」也直接被訓讀為「みかど」，<sup>82</sup>

<sup>79</sup> 《大方等大集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卷五六，頁371-372。

<sup>80</sup> 小島憲之等編，《日本書紀》2（收入《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3，東京：小學館，1996），卷一九，〈欽明天皇〉，頁416。

<sup>81</sup> 馬梓豪，〈日中比較からみる日本古代朝政の特色〉，《國際日本研究》10（2018）：159。

<sup>82</sup> 小島憲之等，《日本書紀》2，卷一九，〈欽明天皇〉，頁416。

意指天皇所統治之國。而且，從百濟王自我稱臣這點而言，此文中之「帝國」具從身分差異觀點來區別「王」與「帝」之意義，或有從此角度來理解的可能性，不過也有可能只是指「貴國」之意。<sup>83</sup> 儘管《日本書紀》中的這一個語詞在後世日本似無直接影響，但如後述，幕末日本的蘭學者從「帝」與「王」之身分差異視角來翻譯並使用「帝國」一詞時，會言及此段記錄。不管如何，有學者已指出，最早用「帝國」一詞來翻譯西方書籍中之概念的是在十八世紀末出版的《泰西輿地圖說》。<sup>84</sup>

### （一）「帝爵ノ國」與「帝國」：《泰西輿地圖說》

余伯納 (Johann Hübner, 1668-1731) 於一六九三年出版德文版的《古今地理學問答》(*Kurze Fragen aus der alten und neuen Geographie*)。該書的荷蘭語譯本為 *Algemeene Geographie, of Beschryving des geheelen aardryks*。江戶時代的蘭學者稱該書為《ゼオガラヒー》(*Geographie*)。朽木昌綱 (1750-1802) 據蘭譯本 *Algemeene Geographie*，寫出《泰西輿地圖說》，並於一七八九年（寬政元年）刊行。<sup>85</sup> 該書成為當時江戶日本最權威的世界地理書，奠定日本海外地理學的基礎。<sup>86</sup>

首先，在該書的開端，朽木就解釋其譯名如下：「ケイセル」（德語 *Kaiser*；蘭語 *Keizer*）譯為「帝」；「コフニンキ」（德語 *König*；蘭語 *Koning*）譯為「王」；「ヘルドク」（德語 *Herzog*；蘭語 *Hertog*）譯為「侯」；「ホルスト」（德語 *Fürst*；蘭語 *Vorst*）譯為「小侯」等等。<sup>87</sup> 朽木明顯是以漢文中「帝→王→侯→小侯」等爵位差異的順序來理解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等歐洲國家。

在該書中，朽木不直接使用神聖羅馬帝國這個國名，只有在討論「ドイツラント」（德文版 *Deutschland*；蘭文版 *Duitschland*）的地方說拉丁語稱該地為「ゼルマニア」(*Germania*)，並說「此地昔時是一統之帝國」。<sup>88</sup> 在另一處，朽木指出「歐洲有三個帝國，其一是義大利的皇帝，即統合歐洲之帝王，昔時離開義大利後，遷都到德意志地區（『ドイツラント』）的維也納（『ウエイ子ン』）」，並論及其

<sup>83</sup> 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52。

<sup>84</sup> 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43。

<sup>85</sup> 紀田順一郎編，《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收入《近代名著解題選集》5，東京：クレス，2006），頁 90。

<sup>86</sup> 紀田順一郎，《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頁 88。

<sup>87</sup>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江戶：松本善兵衛，1789），「凡例」，頁 2。

<sup>88</sup>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卷九，頁 1-2。

至今被諸國尊為「帝」。<sup>89</sup> 從其論我們可知他所討論的是神聖羅馬帝國。另外，他也提及後來興起的俄羅斯帝國（「リュスラント」）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トルコ」）和中國（「震旦」）為「帝國」。<sup>90</sup>

其所謂的「帝國」是指「帝爵之國」（「帝爵ノ國」），即相對於「王爵ノ國」、「侯爵ノ國」的國家。「王爵ノ國」（「王國」）分別是西班牙（ヒスパニヤ）、法國（フランカレキ）、葡萄牙（ポルトガルホ）、英國（エンゲラント）等等。其他尚有「侯國」和「宗法ヲ以テ治ムル僧官ノ主」（教宗）。另外，他也指出周遭國家皆向法國「朝貢」，故該國雖非「帝爵之國」，但其勢強大。<sup>91</sup>

這裏所提及的四個「帝國」皆是領地廣大、有屬國（有王國、侯國等），並且其君主為「帝」（Kaiser/Emperor），即實行帝制（君主制）的國家。朽木似乎認為是否稱為「帝國」的重點在於該國（或該國君主）是在某區域國際秩序中位居等級階層體制（帝→王→侯等差異的爵位制度）中的頂端。該書寫於西發里亞條約（1648）之後，但作者似對於同一時期歐洲主權國家體制的情況並不了解。然而重要的是，在這一文本中「帝」與爵位制度的聯結有了「帝爵之國」之類的概念。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因為對應於該書中翻為「此地昔時是一統之帝國」的地方，實際上蘭文版 *Algemeene Geographie* 中有提及其國名為 *heilige Roomsche Ryk van de Duitse Natie*，拉丁語為 *Sacrum Imperium Romano-Germanicum*，並在解釋神聖羅馬帝國歷史時提及 *Roomsche Keizerryk*，且在多處使用 *Keizer* 和 *ryk* 等詞。<sup>92</sup> 若上溯至德文版 *Kurze Fragen aus der alten und neuen Geographie*，我們發現其中沒有提及國名，討論 *Teutschland* 的地方也無出現 *Kaiserreich* 一詞，但有論及 *Kaiser* 和 *Reich*，說：“In Teutschland ist gar ein anderer Zustand, als in andern Königreichen: Denn da ist ein Kaiser, als das Ober-Haupt des Reichs”（德意志地區的狀況與其他王國不同：因為前者有一個皇帝作為帝國的元首）。<sup>93</sup> 從德文版至蘭文版已有許多變

<sup>89</sup>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卷一，頁 2-3。

<sup>90</sup>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卷一，頁 3。

<sup>91</sup>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卷四，頁 15。

<sup>92</sup> Johann Hübner, W. A. Bachiene, and Ernst Willem Cramer, *Algemeene geographie, of Beschryving des geheelen aardryks*, part III (Amsterdam: Pieter Meijer, 1769), pp. 3-5. 又該書荷蘭文版有一卷本、四卷本和六卷本，據研究朽木應是使用本文所引的六卷本（紀田順一郎，《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頁 90）。

<sup>93</sup> Johann Hübner, *Kurze Fragen aus der alten und neuen Geographie* (Leipzig: Gleditsch, 1693), pp. 398-401. 此文的翻譯感謝陳致宏教授幫忙。

化，朽木的日文譯文應也有參考其他書籍，且加入他自己的解釋，如將其國風比擬為如「震旦周末戰國之和親」等，<sup>94</sup> 而涉及基督教的部分則不翻。或因如此，朽木沒有翻出與基督教歷史息息相關的 *heilige Roomsche Ryk van de Duitse Natie*。所以，其所謂的「帝國」或可視為蘭語 *Keizerryk* 或 *Ryk (Reich)* 的譯詞，但筆者以為與其將之視為某詞的譯詞，更適當的理解方式應是：他以中國封建時期的爵位制度來理解神聖羅馬帝國等國，並從「帝爵」的概念來理解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及其帝國狀態，即指其為具「帝」之爵位者所統治之國，從而略稱「帝爵之國」為「帝國」。

但在十八世紀末，不論是「帝爵」或「帝國」應都是未固定的用法。因為如桂川甫周也據 *Algemeene Geographie* 去理解當時的世界地理。但相對於《泰西輿地圖說》只處理歐洲的地理與政治情勢；桂川甫周在《北槎聞略》(1794) 中介紹與俄羅斯通商的五十二國時，談論到整個世界有四大洲（「亞細亞洲」、「歐羅巴洲」、「亞弗利加洲」、「亞墨利加洲」）。其中，帝國（「皇帝統御の國」）有七個，分別是「皇朝」（「大日本」）、「支那」（「大清國」）、「百兒齊亞國」（波斯帝國）、「大莫臥兒國」（蒙兀兒帝國），及位於歐洲的「魯西亞國」（俄羅斯帝國）、「熱爾馬泥亞國」（神聖羅馬帝國）、「都爾格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而且，他也具階層的國際秩序觀，在「皇帝統御の國」外，尚有「王候所理之國」、「立酋長所理之地」等國家、地區。<sup>95</sup> 再者，他把領土並不廣大的日本（「皇朝」）稱為「皇帝統御の國」，也把位於亞洲的「百兒齊亞國」、「大莫臥兒國」稱為「皇帝統御の國」，而不使用「帝國」或「帝爵之國」。可見在十八世紀末前後，「帝國」一詞尚未成為固定的使用詞彙。

## （二）「インペラトヲル」、「ケイゼル」與「帝」：《訂正增譯采覽異言》

後來，山村昌永（才助）依據古斯 (Pieter Goos, 1616-1675) 《萬國航海圖說》(*De Zee-Atlas ofte Water-Wereld: Waer in verthoont werden alle de Zee-Kusten Van het bekende des Aerd-BAodems*, 1669) 和余伯納的《萬國傳信紀事》(*De Staats-en Koeranten-Tolk. Of Woordenboek der geleerden en ongeleerden*, 1732) 等蘭學書籍，

<sup>94</sup>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卷九，頁2。

<sup>95</sup> 桂川甫周，《北槎聞略》（寫本，東京：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卷四，無頁碼。

大幅訂正新井白石所寫的世界地理書《采覽異言》，並曾於享和二年（1802）出版，但大都以寫本流通。如下述，他進一步說：「『インペラトフル』亦羅甸語ナリ。弘郎察呼テ『エムペレウル』ト云ヒ、和蘭呼テ『ケイゼル』ト云。乃チ帝者ノ義ナリ」，把「インペラトフル」、「エムペレウル」、「ケイゼル」(Keizer) 翻譯為「帝」，從而理解「帝」之國為「帝國」。在該書中，山村將蘭學書中所見之「帝國」分為二類，一類是其國有「威德隆盛，讓諸邦臣服之大國之君」者，即有屬國且其君主是「ケイゼル」(Keizer、帝)的君主制國家。這一類在歐洲只有「入爾馬泥亞」(神聖羅馬帝國)，但西洋人也以因之稱「莫斯科未亞」(俄羅斯)、「支那」、「都兒格」(土耳其)、「莫臥兒」(印度)為「帝國」。另外，他也說：如「百兒西亞」(波斯)、「亞毘心域」(衣索披亞)、「馬羅可」(摩洛哥)等「大邦」，及「暹羅」、「日本」、「爪哇的瑪荖蘭」(蘇門答臘)等國，「其勢盛自立不屬於他，因各稱雄於一方，西人又稱為帝國」。<sup>96</sup>

在他看來，日本雖在「亞細亞洲」中，與「支那」、「莫臥兒」、「百兒西亞」等相比，是比較小的國家，但與其他「亞細亞海中ノ大島」中的國家相比，是「帝國一統」的「萬古不易神靈傳統ノ帝國」。<sup>97</sup> 重要的是，山村從天皇系譜的持續性，稱日本乃「萬古不易神靈傳統之帝國」，將日本特別看待。不管如何，他依然將「帝」與「爵」連在一起理解，在一種階層的國際秩序觀中來理解「帝國」。如後述，就日本的情況來說，這可能跟在西方的書籍中，日本有時也被稱為「帝國」(Empire) 有關。

### （三）近世歐洲文獻中的日本：「王國」還是「帝國」

我們也必須思考一下在近世歐洲文獻中日本是如何被理解的問題。<sup>98</sup> 首先，在大航海時代中，貿易商人和許多傳教士來到日本，其中的一位西班牙貿易商人伯納迪諾（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 ?-1619 年以後）在一六一〇年代寫下《日本王國記》(*Relación del Reino de Nippon a que llaman corruptamente Jappon*)。在該書中，他將日本和中國皆稱為「王國」(Reino)，稱天皇為「國王」，但無統治能力。<sup>99</sup> 再

<sup>96</sup> 山村才助（昌永）語，參見新井白石著，山村昌永增譯，杉田勤校訂，大槻茂質參閱，《訂正增譯采覽異言》（出版地不明，1800；東京：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卷一，頁5。

<sup>97</sup> 山村才助的看法，參見新井白石，《訂正增譯采覽異言》卷一〇，頁32。

<sup>98</sup> 這一節的討論參閱前野みち子，〈国号に見る「日本」の自己意識〉，頁47-50。

<sup>99</sup> アビラ・ヒロン (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 著，佐久間正、會田由譯，《日本王国記》（收入《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11，東京：岩波書店，1965），頁42-57, 123。

者，一位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 (João Rodrigues Tçuzu, 1561/1562-1633/1634) 寫下《日本教會史》(*Historia da Igreja de Iapam*, 1620 年代初期成立)。在該書中，相較於他有時稱中國為「帝國」、有時則稱「王國」，對日本則皆稱之為「王國」，並稱天皇為「國王」、最高司令官為「將軍」。<sup>100</sup> 但他有提及當時的歐洲人並不了解日本的政治狀態，故有人稱「王國的最高司令官」為「皇帝」(インペラドール；葡語 *Imperador*)，或稱各地領主為「王」的情況。<sup>101</sup>

其次在法蘭索斯·卡隆 (François Caron, 1600-1673) 於一六四五年在荷蘭出版的《日本大王國志》(*Beschryvinghe van het machtigh koningryk Japan*) 中，日本也是被理解為「王國」(*Koningryk*)，但德川將軍被翻譯為皇帝 (*Keizer*)。<sup>102</sup> 又德國探險家坎普弗爾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所寫的《日本歷史與紀行》(*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於一七二七年先刊行英譯本，書名譯為：“*The History of Japan: Giving an Account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and Government of That Empire; Of Its Temples, Palaces, Castles, and Other ... Journal of a Voyage to Japan*”，副標題中稱日本為 *Empire*。事實上，坎普弗爾將日本理解為有「宗教的世襲皇帝」和「世俗的皇帝」這樣二位聖俗兩分的「皇帝」(*Kaiser, Emperor*) 統治之國家，故在其用法中，「皇帝」有時指天皇，有時指德川將軍。<sup>103</sup> 其書在十九世紀前是歐洲理解日本的重要依據，深具影響力。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歐洲歷史中，雖有時被理解為一種王國，但有時也會被理解為一種皇帝統治之國，一種 *Empire*。

坎普弗爾將日本理解為 *Empire*、德川將軍理解為 *Emperor*，這點特別值得一提。這應是從一種國家制度形態角度，把將軍統率多位大名的德川日本政治制度情況理解為類似神聖羅馬帝國類型的「帝國」。<sup>104</sup> 這當影響了幕末時期來到日本的美國人對德川日本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17 世紀初歐洲人指稱亞洲

<sup>100</sup> ジョアン・ロドリゲス (João Rodrigues Tçuzu) 著，江馬務、佐野泰彦、土井忠生等譯，《日本教会史》上（收入《大航海時代叢書》第 1 期 9，東京：岩波書店，1967），頁 61-149。

<sup>101</sup> ジョアン・ロドリゲス，《日本教会史》上，頁 68。

<sup>102</sup> フランソア・カロン (François Caron) 著，幸田成友譯，《日本大王國志》（東京：平凡社，1967），頁 112。

<sup>103</sup> エンゲルベルト・ケンペル (Engelbert Kaempfer) 著，今井正編譯，《改訂増補日本誌：日本の歴史と紀行》（東京：霞ヶ関出版社，1989），頁 205-217。

<sup>104</sup> 關於這點，感謝渡邊浩教授在給予筆者的私人信件中的指導。

國家時，即便稱其為帝國，但在具體稱『某國』時，仍習慣用『王國』。」<sup>105</sup> 或因如此，我們會在上述的史料中看到日本有時被稱為「帝國」（皇帝統治之國、Empire），有時則被稱為「王國」。不管如何，在歐洲史書中有時將日本稱為「帝國」（Empire）這一情況應影響到德川時代日本的地理書，及外交文書傾向於將日本理解為一種「帝國」。

#### （四）日蘭辭典與日英辭典中的「帝國」

在蘭學地理書中出現「帝國」一詞之後，在文化七年（1810）出版《譯鍵》（藤林普山）和同年出版《蘭語譯撰》（奧平昌高編、馬場佐十郎稿）等和蘭辭典中，荷蘭語的ケイゼレイク（Keizerryk，現代拼法為 keizerrijk）也被翻譯為「帝國」，Keizerdom 也被翻為「王民」、「帝國」、「王威」。<sup>106</sup> 上述的朽木昌綱、山村昌永、藤林普山、馬場佐十郎等蘭學者在人脈方面都屬蘭學知識網絡中之人，故以「帝國」這個漢語詞為 Keizerryk 譯語的做法應已安定化。再者，本木正榮（1767-1822）在一八一四年完成的《諳厄利亞語林大成》也是在這一知識網絡中，選擇「帝國」來翻譯英語 Empire。<sup>107</sup>

從日耳曼語系發展而來的荷蘭語的 Keizerryk<sup>108</sup> 是由 Keizer（帝）與 ryk（國）所組合而成，強調其統治者是皇帝。但如前述，從拉丁語系發展而來的英語 Empire 或其語源 Imperium 的重點不在其統治者是皇帝，而是政府的命令權所及之廣大區域，所以即便是共和制也可是 Empire。有意思的是，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英和和英語彙集》，Batavia, 1830）使用「帝國」為 Empire 譯詞，應受在江戶日本出版的《諳厄利亞語林大成》、《譯鍵》影響，但同一作者在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1847-1848) 這本《英漢字典》中，就不是以「帝國」，而是以「天下」、「國家」來翻譯 Empire。<sup>109</sup>

<sup>105</sup> 曹新宇、黃興濤，〈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頁 62。

<sup>106</sup> 藤林普山，《譯鍵 乾》（出版地不明，出版商不明，1810；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頁 106；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44-45。

<sup>107</sup> 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45-46。

<sup>108</sup> 吉村書中為 Keijzerrijk。

<sup>109</sup> 吉村忠典，《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頁 47-48；張麗華，〈メドハースト『英漢字典』における『訳鍵』『蘭語訳撰』参照の可能性：植物名稱の訳語を手掛かりに〉，《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41（2020）。



讓筆者先來整理一下上述所論：在日本的情況是，「帝國」是從荷蘭文中為翻譯神聖羅馬帝國等帝制國家狀態所創出的語詞，「帝國」一詞當源於「帝爵ノ國」的略稱，在字典中先成為蘭語 *Keizerryk* 的譯詞，後來才成為英語 *Empire* 的譯詞。<sup>110</sup>

### （五）「帝國」與「共和」：《外國事情書》、《坤輿圖識》

渡邊崋山 (1793-1841) 在《外國事情書》描寫歐洲時指出歐洲之「治體」（政體）有三種：一種是「獨立ノ國」（「ヨンベパールデ モナルカール」，即專制君主國）；一種是「守盟ノ國」（「ベパールデモナルカール」，即立憲君主國）；另一種是「共治國」（「ゲメーネベストゲシンド」，即共和國）。同時，他也指出上述三種政體的國家，又可依「位階」再分為「帝國」、「王國」、「上公國」、「大公國」、「侯國」等。<sup>111</sup> 所以，在「ヨンベパールデ モナルカール」（專制君主國）與「ベパールデモナルカール」（立憲君主國）中位階最高的就是「帝國」。但「立憲」的意思並未被清楚理解，故崋山才把專制君主國與立憲君主國的差異理解為「獨立ノ國」和「守盟ノ國」的差異。相對之，崋山也指出北美洲已出現「君長ヲ相立不申……會議共治」的「レピュフレーキ」（共和國）的「侯國」，<sup>112</sup> 即美國。不管如何，這裏重要的是，渡邊崋山區分君主制國家中「立憲君主國」與「專制君主國」的差異，但尚未理解主權國家體制中的平等性，依然具某種階層的國際秩序觀。在其記述中，「帝國」被理解為位階最高的君主制國家，不僅與位階較低

<sup>110</sup> 許多研究已指出，江戶時期蘭學者在編纂日蘭辭典時，參考了傳教士馬禮遜所編的《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等，見吳美慧，〈『英和对訳袖珍辞書』の訳語に関する一考察：メドハーストの『華英字典』との関係〉，《国語学研究と資料》12 (1988): 34-45。這一事實導出許多我們原本認為的近代中國之日源漢字新語追本溯源可能也非日本人所創造。但如傳教士麥都思也參照日本蘭學者所編的日蘭辭典去編日英辭典之外，其對日文的知識也影響其《英漢字典》的編纂。更重要的是，麥都思是蘇格蘭傳教士米憐的助手，米憐在撰述載有「帝國」一詞的《全地萬國紀略》時，不知是否有參考麥都思的意見。況且，米憐本人也到過與江戶日本有貿易往來的荷蘭人所統治的巴達維亞等地，參 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J. Snow, 1840), pp. 130-139。這些都令筆者對於「帝國」一詞出現在海外中文報刊中是否真的與日本無關這點不得不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sup>111</sup> 渡邊崋山，《外國事情書》（收入《渡邊崋山》〔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5，東京：岩波書店，1971〕），頁 24。

<sup>112</sup> 渡邊崋山，《外國事情書》，頁 21。

的「王國」等有區別，也有別於不立君長的「共治國」（「ゲメーネペストゲシンド」或「レピュフレーキ」，即共和國）。

再來，箕作省吾（1821-1847）在《坤輿圖識》（1845）中，相較於《訂正增譯采覽異言》，把日本（「本邦」）、中國（「漢土」）、和神聖羅馬帝國（「獨逸」）、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都兒格」）、俄羅斯帝國（「魯西亞」）等五個國家稱為「帝國」，並指出稱摩洛哥（「馬邏可」）為「帝國」之誤。<sup>113</sup> 而且，在《坤輿圖識》中，箕作省吾將世界的國家大分為「獨立國」與「屬國」，然後將歐洲的「獨立國」又分為「帝國」、「侯國」與行「共和政治」之國等。在他看來，「帝國」當是相對於位階較低的「侯國」和「共和政治」等不同體制的國家。他當與前述的渡邊崋山一樣依然具有某種階層的國際秩序觀。

總之，渡邊崋山、箕作省吾等蘭學者所理解的「帝國」重點是：**非共和國，且為最高等級身分上的統治者（包括皇帝、天皇、蘇丹、沙皇等）統治之君主制國家，其是否有屬國等似乎是較為其次的。**

## 五・德川儒學、國學與「帝國」的使用

### （一）儒學

上述蘭學者所翻譯、製作的蘭學書成為儒者與國學者理解海外知識的主要來源。不過，如後期水戶學代表的會澤正志齋雖接受蘭學的海外知識，但卻抵抗歐洲人對世界之分類方式。在《新論》中，他據神州與華夷的世界觀，將「中國」（日本）理解為「頭」，「海西諸國南海諸島」（亞洲）理解為身體正面，「西洋諸蕃」理解為「股脛」，「海東諸國」（美洲）理解為背面。如此的分類是以其對蘭學地理學之「五大洲」的地理區分方式為基礎的。但對於「五大洲」這一近代歐洲的地理知識，他卻指出「亞細亞」等概念的翻譯性、他稱性，說：「亞細亞、亞弗利加、歐羅巴」等語詞是「西夷所私呼、而非宇內之公名」。<sup>114</sup> 即會澤雖瞭解歐洲人認識世界的分類方法，但拒絕主動使用該分類方法來認識「萬國」（世界）。

---

<sup>113</sup> 箕作省吾，《坤輿圖識》（江戶：須原屋伊八等，1847），卷一，頁1；卷二，頁2；卷三，頁8。

<sup>114</sup> 會澤正志齋，《新論》（收入今井宇三郎等校注，《水戶學》〔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3，東京：岩波書店，1973〕），頁396。

對於蘭學書中的「帝國」論乃至「帝國」一詞的翻譯性，會澤都將之視為問題。如在上述之山村才助的世界地理書中，日本雖亦被稱為「帝國」，然而，對於山村的分類，會澤認為「亞毘心域」以下諸國有「黑人愚陋之俗」者、「兵力劣弱」者等，沒有資格稱為「帝國」。又說：「蘭學者謂前數國之王為帝，即西夷所稱奚瑟爾者，原出於邏馬先祖之名，蘭學者譯為帝者，特假漢字以分尊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之字也」，不用從歐洲語言中之「奚瑟爾」翻譯過來的「帝國」一語。<sup>115</sup> 因為那是以漢文脈中之「漢字」本有的「尊卑之等」（即帝→王→侯等差異）的語意翻出，無法表現出他所謂的「帝」之義。

但在之後的著作中，會澤稱「獨逸」、「都兒柏（格？）」、「魯西亞」之「王號奚瑟爾，貴於諸國王一等」，並在注中強調「翻譯家稱為帝國以其尊於王，假稱之。其實奚瑟爾與帝字義別」。<sup>116</sup> 會澤已清楚說明幕末日本知識人是在尊重身分差異的意識下，指「奚瑟爾」（蘭語 *Keizer*）比「王」更尊貴一等，故選擇「帝」為「奚瑟爾」的譯語，從而創造「帝國」一詞。但會澤認為「帝」之字義本不同於「奚瑟爾」。其後，會澤又曰：

而強兼弱，大併小，其最強者，清及魯西亞、漢義利、都兒格，而獨逸、佛蘭、伊斯把、李漏生次之。若其序列尊卑，則以 神州及清、獨逸、魯西亞、都兒格為第一等（翻譯家云帝國，假稱也。說見上，其實稱帝者，神州及清國而已。而 神州及四國之外，有翻譯所稱帝國者，或弱或小，不足齒列焉）。<sup>117</sup>

會澤認為以歐洲語言中之「奚瑟爾」統治之國的意思，以等爵身分、階層的國際秩序觀來理解「帝國」的話，則在「神州」及「清」之外，「獨逸」、「魯西亞」、「都兒格」都是第一等意義的「帝國」。但會澤特別之處在於指出若以漢文脈本有的「帝」之意來理解的話，則可稱「帝」的只有「神州」與「清」。在別處，他也說：「能明天地之大道，人倫之正者，清與神州 蒼海之一粟。」<sup>118</sup> 顯然，在他的理解中，漢文脈中「帝」比諸歐洲語言中之「奚瑟爾」，具更特殊與崇高的意涵。

因為中國經典《中庸》中有：「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等言及「帝」的經文。會澤引之以論古代日本的政教。會澤說：「天也，帝也，民所尊奉畏敬，而使一世

<sup>115</sup> 會澤正志齋，《新論》，頁 396。

<sup>116</sup> 會澤正志齋，《下學適言》（茨城：會澤善，1892），卷三，頁 29。

<sup>117</sup> 會澤正志齋，《下學適言》卷三，頁 32。

<sup>118</sup> 會澤正志齋，《下學適言》卷三，頁 32。

皆仰其父祖為天為帝。嚴之至也」，<sup>119</sup> 雖曖昧化「帝」與「天」的區別，但明確理解「帝」有「天」之意。特別重要的是，他在日本神話脈絡中刻意曖昧化「天祖」（天照大神）與「天」的關係，或可說他將「天祖」等同於「帝」來理解。<sup>120</sup> 所以，在會澤的用法中，「帝」不只指一國中之最高統治者皇帝或天皇，也具「天」、「天祖」之特殊意涵。在他的想法中，真正的「帝國」當指涉如日本這般由「天祖」降命以統治人世的國家。這即是具特殊「國體」的國家→「帝國」。

另一方面，在會澤的世界認識中，「清」與「神州」相較，無疑地「神州」才是最特殊與優秀的。所以，他在《時務策》(1862) 中曰：「萬國稱神州為帝國，自古以來受尊重（神州ハ萬國ヨリモ帝國ト號シテ古ヨリ尊レシヲ）。」<sup>121</sup> 他雖無明言，但這一意義的「帝國」或包括古代《日本書紀》中之「帝國」（みかど）的用法。我們可知會澤也從特殊的和文脈（日語和日本古史）中來理解「帝國」，故他認為「萬國」中「神州」（「天朝」）的天皇最有資格號稱為「帝」。所以，會澤在其晚年主張開國的《時務策》中使用「帝國」一語，以強調具特殊「國體」之日本的尊貴性。<sup>122</sup> 也就是說，會澤在從歐洲語言翻譯過來的「帝國」一詞中，強調漢文脈與和文脈特有的語意。他將日本神話與古代歷史帶入他的「帝國」想像中，主張「萬國」中之「帝國」（日本）的優越性。

## （二）國學

在上述蘭學乃至儒學論述書的影響下，國學者在他們的世界地理與歷史論述也開始使用「帝國」一詞。國學者大國隆正（1793-1871）在一八五五年完成《本學舉要》。他所謂的「本學」是指非儒佛之學，說明天地成立的神代古事及人道。<sup>123</sup> 該書是要獻給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從這點也知，他與水戶學者有所往來。他比會澤更清楚地論證日本才是地球上萬國中之唯一真正的「帝國」。大國隆正在階層的秩序觀中來理解國際秩序，認為日本與「支那」、「魯西亞」、「獨逸」、「都兒格」

<sup>119</sup> 會澤正志齋，《正志齋文稿》（東京：國書刊行會，2002），〈作洛論中〉，頁70。

<sup>120</sup> 藍弘岳，〈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述及其思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1（2018）：175-178。

<sup>121</sup> 會澤正志齋，《時務策》（收入今井宇三郎等，《水戸學》），頁364。

<sup>122</sup> 會澤正志齋，《時務策》，頁364。

<sup>123</sup> 大國隆正，《本學舉要》（收入田原嗣郎等校注，《大國隆正》〔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0，東京：岩波書店，1973〕），頁405。

都是第一等的「帝爵之國」，但只有日本才是「皇統」不絕（萬世一系）的特別尊貴的國家。即日本與一般的「帝爵之國」不同，具「大帝爵之國體」，故其他國「帝爵之國王」也應以天皇為「世界之總王」，並入朝稱臣。<sup>124</sup> 在他的世界觀中，日本理當是「大帝國的大帝國」。<sup>125</sup> 從他國的角度來說，這種理解太自我中心與狂妄，但卻在日本一直有其追隨者。

在大國隆正之後，竹尾正胤更提出了《大帝國論》(1863)。<sup>126</sup> 他參照《迪彝篇》、《洋外通覽》、《增譯采覽異言》、《天朝無窮曆》、《弘仁曆運記考》、《西洋列國史略》、《萬國傳信紀事》、《地球說略》、《新撰年表》、《西洋全史》、《坤輿圖識》、《坤輿圖識補》、《洋外紀略》、《魯西亞志》等蘭學者、儒學者乃至國學者所著的世界史地書。<sup>127</sup>

他的帝國論繼承了蘭學書中已有的階層式的國際秩序觀。把歐洲封建秩序中的國家形態的差異和政體的差異混在一起，提出一種「帝國」、「王侯」、「共和政治」等國家體制所組成的國際秩序觀。<sup>128</sup> 此外，其特色是據國學用法，不僅稱日本為「帝國」，也稱為「皇國」，並把「佛蘭西」也列為「帝國」。<sup>129</sup> 這當是指拿破崙三世波拿巴稱帝後的國家體制。

在該書的注中，他明確指出「帝國」一詞首見於前述《日本書紀》。而他也認同會澤正志齋不願意使用「亞細亞」等「西夷」所命私名的想法，但具更現實主義的態度，認為那也是「世之通名」，故暫用之。<sup>130</sup> 又，竹尾也繼承上述會澤和大國隆正的皇國日本優越性思想，但明確主張雖然上述除日本之外的支那、獨逸、都兒格、魯西亞、佛蘭西等五個帝國皆是「正統的帝國」（即有正確血統的君主國），但只有日本（「大皇國」）是貫通全世界的「大帝爵國」，其他皆是私自僭稱的「偽帝國」。<sup>131</sup>

如上，在竹尾的用法中，只有日本是至高無上的真「帝國」，其他都是「偽帝

<sup>124</sup> 大國隆正，《本學舉要》，頁416-417。

<sup>125</sup> 大國隆正，《真公法論并附錄》（收入田原嗣郎等，《大國隆正》），頁496。

<sup>126</sup>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收入《國學運動の思想》〔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1，東京：岩波書店，1971〕）。

<sup>127</sup>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紹介文，頁487。

<sup>128</sup>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頁490。

<sup>129</sup>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頁490。

<sup>130</sup>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頁490。

<sup>131</sup> 竹尾正胤，《大帝國論》，頁491。

國」，這是「帝國」說與國學世界觀結合後必然的結果。所以，國學語言中，「帝國」從蘭語 Keizerryk 及英語 Empire 的譯詞轉變為具日本特殊意義的稱號。

### （三）外交文書與「帝國」稱號

此外，同時在黑船來襲前後，「帝國」一詞更常見於日美的外交文書中，用以指涉日本。如在「合眾國水師提督口上書和解」中就有「帝國日本ノ貴官」等表現，水戶藩的藩士也傳抄該文。<sup>132</sup> 日本在對外文書上自稱「帝國」始於一八一〇年代的一篇俄羅斯對日外交關係的翻譯文書，其中日本被翻譯為「大日本帝國」。<sup>133</sup> 到了嘉永七年（1854）黑船來襲，之後日美兩國簽定《日米和親條約》。在該日文版的條約中有「亞墨利加合眾國と帝國日本兩國の人民、誠實不朽の親睦を取結び……」一文，<sup>134</sup> 即日本人開始自稱為「帝國」，正式在外交文書以「帝國日本」為國號。之後，安政五年（1858）簽定的《日米修好通商條約》本文則使用「帝國大日本」的國號，脇坂中務大輔自稱「大日本帝國外國事務老中」。在安政五國條約中，除法國之外，其他條約皆有使用「帝國」一詞。<sup>135</sup>

在幕末外交條約中，使用「帝國」一詞或是因為幕末知識人意識到相較於「神州」、「皇國」等固有自稱日本的說法，「帝國」是源於西方人書籍的譯詞。但不可忽視的是，如上述會澤正志齋和國學者之思想所示，他們也能從漢文脈與和文脈來強調其日本特殊性。所以，《日米和親條約》雖有和文、英文、荷蘭文和漢文四種版本，但有意思的是，在漢文版中並無「帝國」一詞。<sup>136</sup> 亦即該詞是於和文脈中，強調「帝國日本」（翻自英文版 Empire of Japan）與「亞墨利加合眾國」形式對等的情況中被使用的。所以，「帝國日本」這一自我稱謂當是主權國家體制已逐漸被理解的情況中，為強調日本的尊貴性與希求某種普遍性、平等性的意義下被命名使用的。但簽定條約的主體是以將軍為首的幕府，故邏輯上將軍被視為日本的統治者（條約上的英文是 the August Sovereign of Japan），只不過實際上日本還有一

<sup>132</sup> 會澤正志齋，《時務策》，頁 364。

<sup>133</sup> 桐原健真，〈「帝國」言說と幕末日本〉，頁 66。該史料收入《通航一覽》卷一三三，頁 86。

<sup>134</sup> 東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料編纂掛編，《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国關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第 5 卷，頁 452。

<sup>135</sup> 桐原健真，〈「帝國」言說と幕末日本〉，頁 58。

<sup>136</sup> 其漢文版內容為「現今亞美理駕合眾國謀與日本國人交相親睦」（東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料編纂掛，《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国關係文書》第 5 卷，頁 449）。

個天皇。到底誰才是「帝國日本」真正的「帝」這個問題，在面對外來條約的政治現實中，成為棘手且重要的問題。

如上述，在歐洲的文獻中，從十七世紀德川政權成立以後，德川將軍也會被理解為 Emperor，而日本有時也會被理解為 Empire。或是受到上述坎普弗爾 *The History of Japan* 的影響，<sup>137</sup> 在一八五三年美國總統菲爾莫 (Millard Fillmore, 1800-1874) 寫給日本的國書中，就稱德川將軍 the Emperor of Japan。<sup>138</sup> 不管如何，這種以德川將軍為 Emperor 的說法，在十九世紀中期，國學與後期水戶學興起以及大政委任論已形成的時代，已受到質疑。德川將軍不再理所當然地被視為 Emperor。實際上，按國學與後期水戶學的思想，天皇才是代表日本的 Emperor。在這個情況中，吉田松陰 (1830-1859) 批判幕府在與美國、俄國、英國通信、簽約時自稱「日本帝國政府」一事，認為這樣會使外國人以為幕府是「皇國之至尊」，應改稱「征夷府」。<sup>139</sup> 他主張在以漢文為外交文書基準，在帝→王→侯這種儒學名分秩序觀念中，代表日本的簽約者必須是天皇，天皇必須是真正的元首，日本才能維持「帝國」的身分。<sup>140</sup> 這一希望天皇親政的政治主張最後主導幕末的政治運動與思想，國學者們也都被捲入其中，構築出天皇與日本中心的國際秩序觀。從日本國家制度變化的過程來說，「帝國」(Empire) 一詞從指涉德川將軍所統治之國家，轉變為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之國家。

## 六・明治知識中的「帝國」：從「大日本帝國」到「帝國主義」

如上述，在近世歐洲文獻中，日本有時被稱為「王國」，有時被稱為「帝國」，而幕末日本的蘭學者、儒學者、國學者則主要自稱日本是「帝國」（當然還有「皇國」等其他說法）。到了明治時代，雖有學者如福澤諭吉認為「帝國」與「王國」只是「名義之等級，至其國力之強弱，名實相齟齬，有比帝國強的王國，比王國強

<sup>137</sup> 關於這點，感謝渡邊浩教授的指導。

<sup>138</sup> Francis L. Hawk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China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Washington: A.O.P. Nicholson, 1856), p. 256.

<sup>139</sup> 吉田松陰，〈黙霖に与ふる書〉，氏著，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東京：大和書房，1972），第2卷，頁358。

<sup>140</sup> 桐原健真，〈「帝國」言説と幕末日本〉，頁81-83。

的侯國」，<sup>141</sup> 但這種務實的意見似並非主流。明治天皇於慶應三年十二月九日（1868年1月3日）宣言王政復古。將軍和天皇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帝」的問題在明治維新後得到解決，受國學與後期水戶學等影響的王政復古論和吸收西方政治思想的文明開化論交錯且同時並行，打造以天皇為首的「帝國」（非「王國」，也非純粹源於國學的「皇國」）之聲成為主流。所以，在《明六雜誌》等明治初期的雜誌和岩倉美歐回覽使節的話語中也出現如「日本帝國」、「我帝國」等用詞。<sup>142</sup> 在蘭學已沒落的明治前期，他們似乎更容易傾向於將「帝國」視為對譯 Empire 之詞，但我們也必須從漢文脈與和文脈來理解之。

### （一）「大日本帝國」

所以，我們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以前，就可看到許多以「日本帝國」「帝國」為名的書籍出版。如加藤景孝，《日本帝國九族相續法等親服忌圖解》（東京：羽毛田侍郎，1877）；內國勸業博覽會事務局編，《日本帝國誌略》（東京：內國勸業博覽會事務局，1877）；高田義甫，《大日本帝國人義務指掌》（東京：高田義甫，1878）；細川廣世，《日本帝國形勢總覽》（東京：細川廣世，1883）；井上政治郎《帝國史 第1編》（東京：吉川半七，1888）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在上述漢文脈與和文脈中意識到帝室（皇室）統治日本的歷史與文化的書籍。

再者，《大日本帝國憲法》是在岩倉具視、井上毅、伊藤博文等人的主導下，選擇以一八五〇年《普魯士憲法》（*Verfassung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為模範，打造出的日本憲法。其草案實際上是據德國人法律顧問赫爾曼·羅斯勒（Hermann Roesler, 1838-1894）所撰述的德文草案翻譯為日文版，再以之為參考底本後多次修正而成。<sup>143</sup> 羅斯勒的德文版中草案題為“*Entwurf einer Verfassung für da Kaisertum Japan*”，日譯為「日本帝國憲法草案」。草案中，多次使用 Reichs 的地方也翻譯為「帝國」。<sup>144</sup>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或可視憲法中的「帝國」譯自德文的 Kaisertum（指皇帝統治之國，可視為與 Kaiserreich 約略同義，但主要用於 18、19 世紀）和

<sup>141</sup> 福澤諭吉，《掌中萬國一覽》（收入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編，《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9〕，第2卷），頁473。

<sup>142</sup> 前野みち子，〈国号に見る「日本」の自己意識〉，頁40-43。

<sup>143</sup> 小嶋和司，《明治典憲体制の成立》（收入《小嶋和司憲法論集》1，東京：木鐸社，1988），頁3-4。

<sup>144</sup> 小嶋和司，《明治典憲体制の成立》，頁10-37。



Reichs。但早在這之前，「帝國」一詞其實也出現在其憲法草案和其他書籍上，以和皇室歷史文化相關的方式使用。如一八七六年十月的元老院憲法草案第一篇第一條即是「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ノ皇統ヲ以テ之ヲ治ム」，第二篇就名為「帝國」。<sup>145</sup> 又，筑前共愛會在一八八〇年提出的憲法草案就名為「大日本帝國憲法概略見込書」。<sup>146</sup> 又，透過羅斯勒等人的幫助，才得以深化普魯士憲法知識的井上毅，在一八八七年五月所提出憲法草案試草中第一條就是「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ノ天皇ノ治ス所ナリ」，<sup>147</sup> 而井上毅之所以如此理解，與後述的國體論相關。總之，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發布的憲法被稱為《大日本帝國憲法》（又稱《明治憲法》、《帝國憲法》）。至此，「大日本帝國」成為日本的正式國號。《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所謂的「帝國」或可視為德文的翻譯，但所謂「日本帝國」背後的意涵則必須以延續上述漢文脈與和文脈中之日本儒學和國學語言來理解。

《大日本帝國憲法》主要參考的是《普魯士憲法》，該憲法相較於一八三一年制定的《比利時憲法》(*Verfassung Belgiens*)，其保障人權的要素極弱，是部強調憲法制定權力掌握在國王手上的欽定憲法。<sup>148</sup> 又，相較於一八七一年制定的《德意志帝國憲法》(*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是聯邦國家的憲法，《普魯士憲法》則單純是中央集權的憲法，故非聯邦國家的明治國家所參照便是《普魯士憲法》。<sup>149</sup> 但兩者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因為《明治憲法》在制定過程中也加入許多日本要素。我們關注兩者的不同點之一是，《明治憲法》的本文前有告文、上諭、勅語，相較之，《普魯士憲法》則只有簡單的前文。<sup>150</sup> 如〈憲法發布勅語〉宣稱：「惟我祖我宗，依倚我臣民祖先協力輔翼，以肇造我帝國，垂於無窮（惟フニ、我カ祖我カ宗ハ、我カ臣民祖先ノ協力輔翼ニ倚リ、我カ帝國ヲ肇造シ以テ、無窮ニ垂レタリ）。」<sup>151</sup> 這句話令人思及前引《漢書》「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但「大日本帝國」非如中國皇帝由世襲天

<sup>145</sup> 元老院編纂，〈日本國憲按〉，《陸奧宗光關係文書》61-3（1876年寫本，東京：国会圖書館藏）。

<sup>146</sup> 明治神宮編，《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史》（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80），頁230。

<sup>147</sup> 伊藤博文編，《憲法資料》（收入《秘書類纂》，東京：秘書類纂刊行會，1935），上卷，頁310。

<sup>148</sup> 石村修，《明治憲法 その獨逸との隔たり》（東京：專修大學出版局，1999），頁29-31。

<sup>149</sup> 石村修，《明治憲法 その獨逸との隔たり》，頁31-33。

<sup>150</sup> 小森義峯，〈明治憲法とプロシア憲法の比較憲法的考察〉，《憲法論叢》5（1998）：39-40。

<sup>151</sup> 伊藤博文編，《憲法義解》（東京：岩波書店，1940），頁192-193。

子承天命統治天下的「天命」邏輯，而是如後述，天祖降勅語於天孫，並由天孫之子孫世襲統治日本的「國體」邏輯。

所以，《明治憲法》第一條到第四條就是與「國體」相關的規定，相對之《普魯士憲法》則僅有「據上帝之恩寵」等語而已。<sup>152</sup> 這四條分別是第一條「大日本帝國ハ万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第二條「皇位ハ皇室典範ノ定ムル所ニ依リ皇男子孫之ヲ繼承ス」、第三條「天皇ハ神聖ニシテ侵すヘカラス」、第四條「天皇ハ國ノ元首ニシテ統治權ヲ總攬シ此ノ憲法ノ條規ニ依リ之ヲ行フ」。我們據明治憲法解釋的權威文本《憲法義解》簡單地解釋這四條的話，其重點是：第一條指出「萬世一系」的天皇擁有「大日本帝國」的統治權。《憲法義解》<sup>153</sup> 解釋曰：「本條首めに立國の大義を掲げ、我が日本帝國は一系の皇統と相依て終始し、古今永遠に互り……。」第二條強調該統治權承自於祖宗，傳之子孫，故子孫必須是「皇男子孫」。第三條則強調天皇雖需尊重法律，然法律不具責問君主的力量。第四條主張天皇總攬的統治權是「主權之體」，必須依憲法條文行使這點則是「主權之用」，強調其立憲君主制的面向。<sup>154</sup> 這四條的主要意義即是以憲法來鞏固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固有「國體」。<sup>155</sup>

憲法解釋是高度複雜的問題，我們不再多費篇幅討論。筆者想指出的重點是，「帝國」一詞在憲法本文、〈憲法發布勅語〉乃至《憲法義解》的解釋中不斷被使用，這使得「帝國」好似存在久遠的用語，且被理解為在久遠之前就是天皇祖宗所創建的國家，然而「帝國」實際上是譯語。其實，不只「帝國」是新創建的語詞，「萬世一系」這一用語也是如此。<sup>156</sup> 這一表述日本「國體」觀念的條文實際上立基於前述後期水戶學和國學等傳統思想，涉及對古史解釋的問題。因為不是人民，也不是天或上帝，而是後期水戶學者會澤正志齋所說的「天祖」（天照大神）之語才是天皇家族能永遠統治日本的根據。因為《憲法義解》訴諸於《日本書紀》中「天祖之勅」（其內容為「瑞穗國是我子孫可王之地宜爾皇孫就而治焉」）以解釋為何天皇祖宗具統治日本的大權。然「天祖」不是具普世性的「天」，也不是「上帝」，

<sup>152</sup> 小森義峯，〈明治憲法とプロシア憲法の比較憲法的考察〉，頁 41-44。

<sup>153</sup> 《憲法義解》表面上的作者是伊藤博文，但一般據信是井上毅的文章。井上毅在制定憲法時，參考的書籍就有後期水戶學的《新論》等。夜久正雄，〈大日本帝國憲法と井上毅の國典研究〉，《亞細亞大學教養部紀要》23 (1981)：75-86。

<sup>154</sup> 伊藤博文，《憲法義解》，頁 22-27。

<sup>155</sup> 伊藤博文，《憲法義解》，頁 22。

<sup>156</sup> 木野主計，《井上毅研究》（東京：続群書類完成會，1995），頁 381-382。

故訴諸「天」的革命理當不會在日本發生，而上帝的國度也不會降臨日本。「天祖」似「天」而非「天」，以「天祖勅語」支撐的「國體」永遠恆久存在但神秘、不可捉摸。這些曖昧性讓明治官僚得以打造出一部具訴諸日本歷史特殊性的憲法，也使之難以被模仿。

雖然《大日本帝國憲法》是部欽定憲法，有其將日本打造為立憲君主國，將政治現代化的一面，但當源於歐洲的立憲主義被吸收至日本時，<sup>157</sup> 其與日本本有之傳統（特別是源於後期水戶學和國學的「國體」論與前述「帝國」論）的調整便成為非常重要的思想史課題。

穗積八束（1860-1912）就認為立憲的第一步是明治維新，維新則源於「國體」的自覺，「國體」自覺則又來自國史的回顧。江戶後期國史的回顧不外乎指後期水戶學與國學者的日本古史論。<sup>158</sup> 正是在這一個意義上，江戶後期的古史論與《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成立在思想史上有所關聯。穗積八束也置身於此傳統中，其父與祖父就是國學者，<sup>159</sup> 而他自身也明言是「水府的史論」和「國學之振興」才得以「明千載史跡」。<sup>160</sup>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之後，方才歸國的穗積八束就對該憲法進行一場名為「帝國憲法ノ法理」的演講。在該演講中，他說：「國家ハ統御ノ主體，天皇即チ國家。」<sup>161</sup> 即他主張天皇之權不受憲法本身限制的君主權無限制論，然受到另一法學者有賀長雄（1860-1921）從天皇機關說立場批評其為天皇主權者。<sup>162</sup>

故從日本憲法制定之後，「大日本帝國」到底是立憲君主制還是天皇主權制等

---

<sup>157</sup> 近代立憲主義本是源於西方羅馬法的傳統，在對抗絕對王政的政治情況中，以羅馬法思想為基礎再重構「法治」觀念，並吸收了權力分立和保障自由等觀念形構而成的。高橋和之，〈西欧立憲主義はどう理解されたか——穗積八束の場合〉，高橋和之編，『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東京：岩波書店，2014），頁5。

<sup>158</sup> 穗積八束，〈憲法制定の由來 學生諸君に対する告別辞〉，長尾龍一編，『穗積八束集』（收入『日本憲法叢書』7，東京：信山社，2001），頁92-93。原出於『法学協會雜誌』30.9（1912）。

<sup>159</sup> 高橋作衛，〈穗積八束先生伝〉，長尾龍一，『穗積八束集』，頁237-244。

<sup>160</sup> 穗積八束，〈憲法制定の由來 學生諸君に対する告別辞〉，長尾龍一，『穗積八束集』，頁92-93。

<sup>161</sup> 穗積八束，〈帝國憲法ノ法理〉，上杉慎吉編，『穗積八束博士論文集』（東京：上杉慎吉，1913），頁18-20。

<sup>162</sup> 松井直之，〈清末民初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立憲主義の継受——有賀長雄の天皇機關説に着目して〉，高橋和之，『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頁96-99。

的爭辯持續不斷，但這並非本文所能處理的問題。本文所欲強調的是，對「大日本帝國」這一國名的理解來說，在命名的一開始，就已帶有「萬世一系」這種上述後期水戶學和國學者所強調的日本特殊性的「帝國」語意。也就是說，「帝國」誕生於日本對西方政治思想與體制的抵抗與吸收的矛盾過程中，同時具復古性與現代性，是政治現代化的象徵語彙，也是傳統政治體制得以被保存的通關密語。「大日本帝國」即是近代憲政國家，也是主權國家體制中之一員，後來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但同時也是具特殊日本世界觀的一個「帝國」。眾所周知，後者的意義將在後來的政治過程中不斷地得到闡發的機會。在這之後，議會開始稱為「帝國議會」，又如「帝國大學」、「帝國劇場」、「帝國學士院」、「帝國博物館」、「帝國飯店」等冠以「帝國」二字的學校和公司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sup>163</sup>

## （二）「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一語在明治後期也開始大量出現。但是「帝國主義」這個語詞不是從上述具立憲君主國之意的「帝國」直接發展而來，是英文 *Imperialism* 的譯語。那是由「帝國」加上做為 *ism* 的譯語「主義」而編出的新名詞。<sup>164</sup> 如前述，歐洲約莫到了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才開始大量使用 *Imperialism* 這個語詞的，而日本可說是相當快速就注意到西方世界新術語的流行。首先，高山樗牛（1871-1902）在其寫於一八九八年底的〈罪惡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我們可看到打引號的「帝國主義」一詞出現。在這一引文中，行共和政體的美國也被形容為「帝國主義」。<sup>165</sup>

又如隔年德富蘇峰（1863-1957）於一八九九年出版其著作《社會と人物》，其中有一節名之為「帝國主義の真義」，闡明「帝國主義」概念創於英國，後經美國傳入日本，目前正在成為政界的熱門熟語等，並理解到當時所謂的「帝國主義」是就政治意義而言的「對外積極政策」。<sup>166</sup> 他也說「帝國主義」之意類似於明治日本人本就使用的「大日本主義」或「積極主義」，主張日本當向世界積極宣言日本

<sup>163</sup> 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頁 369。

<sup>164</sup> 齋藤毅，《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東京：講談社，1977），頁 369-385。  
關於「主義」一詞的翻譯，與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關聯，可參閱王汎森，〈「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4：3-88。

<sup>165</sup> 高山樗牛，〈罪惡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時代管見》（東京：博文館，1899），頁 221。  
又，本文中關於「帝國主義」使用例子方面，有些參閱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頁 370-373。然對使用「帝國主義」的特定相關文本，有另加以說明。

<sup>166</sup> 德富蘇峰，《社會と人物》（東京：民友社，1899），頁 41。

要成為「帝國主義者」。但他同時也不忘說明，他所謂的「帝國主義」「不是侵略主義」、「不是排他主義」、「不是武權獨尊主義」、「不是浪費主義」，而是「平和的膨脹主義」。<sup>167</sup> 如上，德富蘇峰是正面肯定「帝國主義」的，並確實掌握了同一時期英國的帝國主義主張。

與德富蘇峰同屬民友社的浮田和民（1860-1946）於一九〇一年出版《帝國主義と教育》，討論英國、俄羅斯和美國的帝國主義發展。在德富蘇峰之論的延長線上，浮田區分歷史上「過去的帝國主義」為「侵略的帝國主義」，主張「現今的帝國主義是民族膨脹自然的結果，非侵略的帝國主義」，而是「民族的帝國主義」、「人民的帝國主義」，主要是因「國民之經濟要求」而起，並主張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也必須立基於國際法，且以「亞洲大陸和新世界及南洋」為其範圍。<sup>168</sup> 而且重要的是，浮田之論經由區分現今的「民族的帝國主義」與「過去的帝國主義」之差異，提出一種善的帝國主義論述，鼓吹日本走向帝國主義之路。篇幅所限，本文無法更詳細討論其說，然其論無疑預告了後來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及其敵人。

之後，與浮田和民同樣是早稻田政治學<sup>169</sup> 奠基者的高田早苗（1860-1938）於一九〇一年抄譯後來擔任中國北洋政府最高顧問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 1869-1923）所寫的 *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00)，書名就題之為《帝國主義論：早稻田小篇》。芮恩施在該書主張相較於十九世紀是民族主義時代，二十世紀將是「民族的帝國主義」時代，並主要就中國問題，討論當時世界列強的「帝國政略」。<sup>170</sup>

但在同一時期的日本，也出現了批判「帝國主義」的聲音。如幸德秋水（1871-

<sup>167</sup> 德富蘇峰，《社會と人物》，頁 42-44。

<sup>168</sup>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東京：民友社，1901），頁 41-42, 47-68。

<sup>169</sup> 高田早苗和浮田和民是早稻田政治學的核心人物，翻譯許多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英美政治學相關領域的書。內田滿，《早稻田政治学史研究：もう一つの日本政治学史》（東京：東信堂，2007），頁 43, 84-147。

<sup>170</sup>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著，高田早苗譯，《帝國主義論：早稻田小篇》（東京：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1），頁 1, 13。該書有其他譯本：吉武源五郎譯述，《世界政策》（東京：世界堂，1903）。有趣的是，鈴木虎雄受後藤新平之命，也將該書譯為漢文，書名為《列國審勢支那政治論》（臺北府：臺灣日日新報社，1904）。另外，梁啟超參閱的獨醒生《帝國主義》也與芮恩施之論有關，參石川禎浩，〈梁啟超と文明の視座〉，《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頁 129-130。這幾本書間的關係等，有待另撰文分析。

1911) 也於一九〇一年出版《帝國主義》一書，對英國、德國、俄羅斯、美國乃至甲午戰後日本自身的帝國主義及與之相關的「愛國心」、「軍國主義」展開分析與批評。<sup>171</sup> 例如他批評所謂的「愛國心」是以討伐外國人為榮的好戰之心，與文明的理想目的不相容。<sup>172</sup> 並且，他定義「帝國主義」意謂「建設大帝國」、「領屬版圖的大擴張」。<sup>173</sup> 其所謂的「帝國」、「帝國主義」已和前述「大日本帝國」無關，必須從歐洲語言的翻譯和理論來理解，且完全不同於德富蘇峰之論。因為其論乃在羅伯森 (John M. Robertson, 1856-1933) 所寫 *Patriotism and Empire* (London: Grant Richards, 1899) 的影響下展開，並透過羅伯森的著作，其思想也與霍布森《帝國主義論》有所關聯。<sup>174</sup>

此外，山口義三 (1883-1920) 也從社會主義觀點寫出《破帝國主義論》，批評當時歐美國家及日本以其帝國擴張為文明福音的帝國主義論。<sup>175</sup> 幸德秋水並為之寫序，引《孟子》之論，批評那些帝國主義國家為「藉帝國主義之美名以行當年霸者之事，輕民命如土芥」。<sup>176</sup> 英年早逝的經濟學鬼才大西猪之介 (1888-1922) 更是在一九一〇年出版《帝國主義論》，參閱了許多當時與帝國主義研究相關的英日文論述，對當時歐美國家的「帝國主義」展開全面的分析。<sup>177</sup>

之後，順著世界左翼思想的開展，青野季吉 (1890-1961) 於一九二四年將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從德文版翻為日文，書名為《資本主義最後の階段としての帝國主義》，一九二五年再版時改譯為《帝國主義論》。<sup>178</sup> 據青野之論，該書是在一九二〇年代日本社會主義陣營開始據馬克思主義研究批判日本社會之政治經濟狀況中出版的。<sup>179</sup> 之後，據馬克思主義展開的日本帝國主義論則不勝枚舉。總之，日本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帝國」實際上已不同於明治前期《大日本帝國憲法》中所謂「帝國」，已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語言中重新被詮釋、

<sup>171</sup>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東京：警醒社，1901）。

<sup>172</sup>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頁 15。

<sup>173</sup> 幸德秋水，《帝國主義》，頁 91。

<sup>174</sup> 服部裕，〈幸德秋水の『廿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に関する一考察：近代文明の理念による帝國主義批判〉，《明星大学研究紀要 人文学部・日本文化学科》29 (2021)：32-33。

<sup>175</sup> 山口義三，《破帝國主義論》（名古屋：鐵鞭社，1903）。

<sup>176</sup> 幸德秋水，〈序〉，山口義三，《破帝國主義論》，頁 1。

<sup>177</sup> 大西猪之介，《帝國主義論》（東京：寶文館，1910）。

<sup>178</sup> 青野季吉，〈改譯について〉，レーニン著，青野季吉譯，《帝國主義論》（東京：希望閣，1925），頁 1-2。

<sup>179</sup> 青野季吉，〈改譯について〉，頁 1。

理解，指「帝國主義國（家）」意義的「帝國」。<sup>180</sup> 不過事實上，日本馬克思主義相關史學著作，似乎不太使用「帝國」，而是使用「帝國主義國」一詞。<sup>181</sup>

如上，在二十世紀初的日本已有許多「帝國主義」的討論。篇幅所限，本文無法再深化相關討論，僅要確認在日本自身正積極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時，也因被日本社會主義者批判，使該詞開始具有負面意義。所以，隨著日本向外擴張，「大日本帝國」這個國名本因對內的政治體制（立憲君主制國家、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君主制國家）之意義而自我命名的，然後來「帝國」一詞也被用來指涉為「帝國主義國家」。這對應在歐語圈中，Empire 相關概念語彙的意義變化。而且，近代日語經大量歐洲知識的洗禮後，在許多情況下，「帝國」已然只是 Empire 的譯語。但重要的是，「帝國」、「帝國主義」這些漢字語詞亦隨漢文脈而傳至中國、朝鮮。

## 七・「帝國」在清末中國的使用：漢文脈的媒介

如前所述，雖然在一八二〇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之一篇由傳教士馬禮遜所撰寫的《全地萬國記略》已使用「帝國」一詞。但筆者認為這個是比較孤立的情況，清末中國的政府官員和知識人應當是在與日本的互動過程中才開始比較有系統地使用「帝國」一詞的。

首先，在一八八七年《申報》〈恭祝 親政大典紀盛〉中，有日本使臣曰：「現在日本帝國與今日親政之 大清國 大皇帝兩國交誼比史傳以前更加親密」，中國使臣則有曰：「蒙大日本國各大臣及各大國公使光臨。」<sup>182</sup> 這或許是在清末，除前述傳教士相關資料外，明確言及「帝國」一詞早期記錄。但我們注意到那位日本使臣自稱「日本帝國」，稱中國為「大清國」。可見如前述，在《明治憲法》頒布前，日本對外就使用「日本帝國」這個國號。相對之，此時「帝國」並非中國人所使用之詞，故中國使臣稱「大日本國」，以對應「大清國」。之後，直到《馬關條約》簽定前後，在《申報》中言及「帝國」一詞的情況，幾乎皆指日本，指涉「帝國議會」、「帝國大學」等等。

<sup>180</sup> 猪俣津南雄，《帝國主義研究》（東京：改造社，1928），頁147等等。

<sup>181</sup>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頁12。

<sup>182</sup> 〈恭祝 親政大典紀盛〉，《申報》第4988期，1887.03.09，讀取2021.06.03。感謝一位審查人提醒使用《申報》方面的史料。又，相關史料的使用，據青蘋果數據中心製作的「申報（1872-1949）資料庫」。

清朝政府與世界各國簽定各種條約。<sup>183</sup> 我們可看到在大部分的條約中，本文與署名的部分，清朝政府都自稱「大清國」。但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04.17) 與日本人簽定的《馬關條約》(《中日講和條約》)的中文版本中，清朝政府稱彼此的最高統治者為「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和「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在條約末署名部分，李鴻章頭銜為「大清帝國頭等欽差全權大臣」；伊藤博文則為「大日本帝國頭等全權辦理大臣」。然日文版則在本文的地方稱彼此的最高統治者「大日本國皇帝陛下」和「大清國皇帝陛下」，署名處則與中文版同。

但在經三國干涉還遼後簽訂的《交還奉天省南邊地方條約》中文版(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1895.11.08)中，本文則改稱「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和「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只在署名處彼此依然在頭銜中使用「大清帝國」和「大日本帝國」。日文版也是如此。而且，在之後清朝政府與其他國家簽訂條約的本文部分和署名處，大都不見「大清帝國」一詞，只在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七日(1899.09.11) 簽定的《大清國大韓國通商條約》的署名處，可見簽約代表者徐壽朋的頭銜為「大清帝國欽差議約全權大臣二品銜太僕寺卿」，韓方代表朴齊純為「大韓帝國特命議約全權大臣從二品議政府贊政外部大臣」。而且在那之後，一直到清朝滅亡前夕簽定的《中日滿韓鐵路國境通車章程》(宣統三年九月十二日；1911.11.02)中，我們才又能在條約署名處，看到簽約代表者在其頭銜中稱「大清帝國……」。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知清朝政府在對外簽約時使用的國名為「大清國」，但不知為何在《馬關條約》中使用「大清帝國」一詞，又在後來的條約幾不再使用之。就現有的材料來說，我們大抵可說只有在對同為漢文圈中之國家時，清朝政府方有可能在簽約代表者的頭銜中使用「大清帝國」一詞。又，清朝政府在簽《馬關條約》時，之所以稱「大清帝國」的交涉過程不得而知，且不知何以日文版本部分不稱「大清帝國」，而稱「大清國」。我們大抵比較可確定的是，在十九世紀九〇年代，「大清帝國」的稱號並未固定化，故在其外交文件中，大都自稱「大清國」。

我們談「大清帝國」這一概念在清末如何被使用之前，應先瞭解朝鮮半島的情況。因為朝鮮王朝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建立「大韓帝國」。在「大韓帝國」這一語詞中的「帝國」明顯指君主制國家(帝制國家)。重要的是，從東亞既有的國

---

<sup>183</sup> 在「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之前清條約協定」網站(<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km2/10010.html>，讀取 2020.10.13)，我們可看到清朝政府與各國簽定的各種條約。以下所論皆依據該網站上展示的條約原版。又，關於條約中的「大清帝國」的使用等問題，感謝歐立德教授在給予筆者的 e-mail 指點相關問題。



際秩序（中華秩序、天下秩序）來說，本來相較於中國皇帝，朝鮮國是向中國朝貢的屬國，其統治者自稱為「國王」。但甲午戰爭之後，朝鮮國從對大清國「屬國自主」的情況走向「獨立自主」，從在與清朝的宗屬關係和近代國際法關係中苦惱不已的狀態中脫離。<sup>184</sup> 朝鮮高宗（1852-1919）稱帝，將朝鮮王朝（「朝鮮國」）改制為「大韓帝國」，脫離與中國的宗屬關係。有意思的是，高宗稱帝時是據明朝《大明會典》和《大明集禮》中之典禮儀式即位的。<sup>185</sup> 即他透過成為中國的皇帝（天下秩序的頂端、明代中華）的方式來脫離與「大清國」（另一個中華）的宗屬關係。所以，儘管「大韓帝國」也有朝向近代國家發展的一面，但其「帝國」想像同時也受傳統中華帝國禮儀所影響。

再回到清末中國來說，從梁啟超（1873-1929）等人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創辦於日本的《清議報》中，我們可已看到梁啟超對於「帝國」一詞的使用，其中他言及日本人稱中國為「老大帝國」，而主張其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sup>186</sup> 另外，在〈立憲法議〉（1901年6月）一文中，將政體分為「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和「民主立憲政體」三種，從一種進步史觀來主張「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於立憲而後已」、「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更主張「**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帝國，萬世不替**」。<sup>187</sup> 在上述的例文中，所謂「帝國」已明確指涉君主制國家，並希望中國能成為有如「大日本帝國」那樣的立憲君主制國家。

爾後，在一連串的政治變動中，一九〇一年慈禧太后（1835-1908）宣布實施「新政」，開始要參酌西方國家乃至日本的制度。李盛鐸（1859-1937）於光緒二十四（1898）年十月到日本視察後任駐日公使，直到光緒二十七（1901）年十一月歸國，並建議實施憲政。<sup>188</sup> 他於光緒二十七年時便有下列的發言：

---

<sup>184</sup> 岡本隆司，《中国の誕生：東アジアの近代外交と国家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頁212-315；森万祐子，《朝鮮外交の近代：宗属関係から大韓帝国へ》（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頁140-199。

<sup>185</sup> 森万祐子，《朝鮮外交の近代》，頁203。

<sup>186</sup>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第1卷，〈第一集上之上本館論說一〉，頁83。

<sup>187</sup> 梁啟超，〈立憲法議〉，新民社，《清議報全編》第2卷，〈第一集上之下本館論說二〉，頁37-45。

<sup>188</sup> 檜原陳政，〈李盛鐸來謁談話筆記〉，《伊藤博文関係文書（その1）》（1899年寫本，東京：国会図書館藏），明治三十二年十月五日。

查各國變法，如美如法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於中國斷不可行。惟俄德日本其變法情形於今日較為相近，俄以**帝國君主專制**為政體，兵強而工商不興，國用不足，負債較多。德日以**帝國君主立憲**為政體，工商進步甚速，賦重而令嚴，國用雖不能有餘，而欠債較少。此各國變法之大較也。現在更定政要，似宜擇善而從。可否飭令政務處參考各國政體，會同商擬，恭候聖裁。俟政體定後，再將各國良法美意酌中，定擬候旨遵行。<sup>189</sup>

他在此文中展開政體論述的方式大致與梁啟超相同，分別以「共和民主」、「帝國君主專制」、「帝國君主立憲」等三種政體來解釋。在這一種理解圖式中，「帝國」意謂不同於「共和民主」政體的君主制國家。李盛鐸也是有深度日本經驗的清末知識人，他的「帝國」使用方式帶有日本痕跡，與梁啟超一樣，是經由與日本同文的漢文脈來直接使用的。

再者，嚴復 (1854-1921) 在一九〇二年將亞當·斯密《原富》中討論馬其頓的腓力二世事蹟中之一段文字翻為：「此為歐洲兵制置用額兵之始，亦即為一國兼數部號英拜爾之始」，以「英拜爾」來翻譯 Empire，然後在注釋中說：「英拜爾近人譯帝國，亦譯一統，或譯天下。亞洲之英拜爾若古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歐洲則古希臘、羅馬、西班牙、法蘭西，今俄、英、德、奧，其主皆稱帝者也。」<sup>190</sup> 嚴復明言「英拜爾」(Empire) 譯為「帝國」或「一統」、「天下」。「一統」、「天下」出自英漢字典，「帝國」即當來自日語。有意思的是，他在《原富》中有一段翻為「布匿之役罷，至於合眾之革而為帝國也」，<sup>191</sup> 直接使用了「帝國」這個譯詞，論述布匿之役是使羅馬從共和政體（「合眾」）轉向「帝國」政體的契機。雖他是在歐洲古代史的討論脈絡中，從常備軍的建立和領土擴張的角度言及「帝國」，但似也從「其主皆稱帝者」來理解「帝國」，將「帝國」理解為與「合眾」不同的君主制政體。若然，嚴復大致與其同時代官員、知識人一樣，將「帝國」理解為一種君主制國家，然如上述，這不同於 Empire 原本語意。其次，他對「帝國」的理解已包括英國。這是與幕末時期蘭學者有所不同的。因為一八七六年之後，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已不只是女王，同時也是印度女皇 (Empress of India)。

<sup>189</sup> 《西巡大事紀》（收入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冊），卷九，〈駐蹕西安府城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 (1901-08-25)〉，頁4237。

<sup>190</sup>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著，嚴復譯，《原富》（收入《嚴復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2卷），頁473。

<sup>191</sup> 亞當·斯密，《原富》，頁474。

如上所述，在戊戌政變後，梁等人開始在日本提倡立憲之論，而在日俄戰爭後，立憲之論更加湧現。因為一九〇五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利被理解為「立憲國」日本對「專制國」俄羅斯之勝利。所以，同年十二月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一月間，大清政府派遣由載澤（1868-1929）所帶領的考察團到日本。載澤本人除了聽到天皇主權論者穗積八束的一部分憲法講義外，也和伊藤博文對談，詢問伊藤憲法制定後的君主權等問題，從而認為日本的君權其實比中國穩固，確信即使導入立憲政體也不損君主國體。另一方面，端方（1861-1911）所帶領的考察團主要是到德國和美國等歐美國家，但途經日本，其考察報告也受有賀長雄等人的日本憲政論影響，主張責任內閣制。再者，一九〇七年時，當時的學部侍郎達壽（1870-1939）也被派遣到日本考察憲政，並在伊藤博文的得力助手伊東已代治（1857-1934）的安排下，接受穗積八束與有賀長雄的憲法講課，理解到《明治憲法》中天皇所擁有的統治大權與不用直接負政治責任的特色，故主張制定欽定憲法。<sup>192</sup> 又，大清政府除派遣官員到日本考察憲政外，穗積八束的《日本憲法要義》、有賀長雄的《官制篇》（將有賀長雄對《憲政講義》的口述翻譯為中文的版本）、高田早苗的《憲法要義》等日本的憲法書也被翻為中文。<sup>193</sup>

在上述這些憲政考察團和日本憲法相關翻譯書的刺激下，清末立憲的討論過程中，來自日本的「明治知識」具重要意義，不僅實質上影響制度建構，也導入了許多相關的政治概念。所以，清末知識人在一九〇六年之後，更清楚地把「大清國」稱為「大清帝國」。「帝國」被理解為相對於「民主」的君主國，如有人主張「中國與日為同種，而帝國宗旨亦近，則立憲自宜取師於日」，<sup>194</sup> 並有人主張「日本持立憲帝國主義、與我國政體為最近」、<sup>195</sup>「立憲國國民之精神發達圓滿，庶幾乎民與國一體，人人有愛國心。立憲潮流所趨」等。<sup>196</sup> 在這樣的潮流下，日本的「立

<sup>192</sup> 曾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国》（京都：思文閣，2009），頁19-22, 61-75。

<sup>193</sup> 曾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頁75。順便一提，從一八九六到一九一一年間，赴日留學生累計達四萬五千人，譯自日文的書籍九百餘種。參閱熊達雲，《洋律徂東：中國近代法制的構建與日籍顧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4-5。

<sup>194</sup> 〈度支部主事陳兆奎條陳開館編定法規等六策呈〉，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冊，頁265。

<sup>195</sup> 〈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福詵奏立憲取法日本應擇善而從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頁272。

<sup>196</sup> 王三讓，《遊東日記》（收入劉雨珍、孫雪梅編，《日本政法考察記》〔收入《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91。

憲帝國主義」成為清末政府與知識人的目標，後來更制定了〈欽定憲法大綱〉(1908)。其中對於「君上大權」的規定為：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二、「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萬世一系」等評述方式是明顯抄寫自《大日本憲法》的。不過，相較於《大日本帝國憲法》是正式的法典，〈欽定憲法大綱〉，只是為制定正式「欽定憲法」的準則，並無嚴格法的約束力。<sup>197</sup>其次，在〈欽定憲法大綱〉制定的前後時期，「大清帝國臣民」、<sup>198</sup>「大清帝國憲法」<sup>199</sup>等詞已開始被使用。

《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具有立憲主義原則與日本傳統特殊思想要素，且具天皇擁有絕對的統治權但不用對失敗政策負責等特色。這對於一方面欲維持帝制、一方面又希望據於中國傳統思想來實施變法改革的大清政府來說，的確具模範作用。然如上所述，「萬世一系」的「大日本帝國」本帶有幕末國學國際秩序觀中之特殊日本中心世界想像之意。當「萬世一系」這種奠基於日本特殊歷史文化所虛構出的修辭被清朝政府採用時，已充分顯露出「大清帝國」所追求的不是「立憲」背後的權力分立原則等，而是君主制的維持。但「大清帝國」畢竟不同於日本，沒有足以維持「萬世一系」政治想像的思想資源，且同時也要面對滿漢對立的政治現實。<sup>200</sup>眾所周知，希望「萬世一系」的滿人皇帝所統治的政權終被漢人所引領的革命行動推翻。

另外，關於使用「帝國主義」的例子，陳力衛已指出「《清議報》譯自日文的例子也是同步的」，<sup>201</sup>即從一八九九年左右開始既已使用，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知識人譯介了日本的帝國主義概念並對之有比較正面的理解，也有清末士紳上呈大清政府，希望大清政府能行「帝國主義」政策。<sup>202</sup>按前述，這應在二十世紀

---

<sup>197</sup> 韓大元，〈明治憲法の「欽定憲法大綱」に対する影響〉，高橋和之，《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頁132。

<sup>198</sup> 〈資政院總裁世續等請速開黨禁以收拾人心摺〉，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頁93。

<sup>199</sup> 〈組織完全內閣並令資政院起草憲法諭〉，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頁98。

<sup>200</sup> 篇幅所限筆者無暇論及，其實在〈欽定憲法大綱〉發布不久後，章太炎就發表過〈虜憲廢疾〉一文批評之。參閱小林武，〈章炳麟「虜憲廢疾」と「欽定憲法大綱」〉，《京都産業大学論集 人文科学系列》46(2013)。

<sup>201</sup> 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頁374。

<sup>202</sup> 曹龍虎，〈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概念的輸入及衍化〉，《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7.4：114。

初出現在日本的善的帝國主義論述、即「民族的帝國主義」論述這一脈絡來理解，不過篇幅有限，有待另撰文論述。

但另一方面，章炳麟 (1869-1936) 等革命派則受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的影響，開始批判「帝國主義」。<sup>203</sup> 特別是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以後，中國的知識人也和日本一樣，開始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來理解、批判「帝國主義」。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本身於一九二四年由李春蕃 (1904-1985) 翻為中文，先在《民國日報》之副刊〈覺悟〉中連載，後於一九二五在上海，以《帝國主義淺說》之名出版。<sup>204</sup> 不過，在之前，馬克思列寧主義意義的「帝國主義」已在中國傳開，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意識形態的核心概念，「帝國主義」等更是國共兩黨共同要抵抗的對象。<sup>205</sup> 在這一轉變中，從清末到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日本帝國」的「帝國主義」已不再是模範，而是必須打倒的對象。

總之，我們大抵可說，在清末準備立憲的過程中，「帝國」一詞開始被頻繁使用來自稱「大清國」。許多知識人（特別是有日本經驗的知識人）會在其文中使用「帝國」一詞。如王賡 (1878-1948) 便在為《東瀛警察筆記》所寫的序文中，形容中國是「具五千載文明優美之歷史，語言文字統一無間之大帝國」，認為「其必雄飛於二十世紀時代以內，無疑也」。<sup>206</sup> 儘管從中國原本的古文與歷史脈絡中，「帝國」不具重要政治意義，在與日本同文的漢文脈媒介下，「帝國」做為一種媒介近代君主立憲國家的概念而被接受、使用。最初清朝政府之所以自稱「帝國」，當因其具皇帝統治之君主制國家意涵，而非因清朝政府多次的軍事征服行動使其成為統治廣大領域且多民族的國家這一歷史過程。但這一歷史過程及清朝多元的統治體系自然可以 **Empire** 的角度理解之。所以，「大清國」是欲以「帝國」之姿成為近代國家的，但辛亥革命的發生突如其來地中斷這個歷史方向的可能性，「大清帝國」最終變成了「中華民國」。

<sup>203</sup> 陳力衛，〈「帝國主義」考源〉，頁 373-379。

<sup>204</sup> 葛靜波、張昭軍，〈國民革命時期列寧《帝國主義論》的譯介與論爭〉，《中共黨史研究》2019.9：68-74。

<sup>205</sup> 曹龍虎，〈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概念的輸入及衍化〉，頁 117-119。

<sup>206</sup> 王賡，〈序〉，舒鴻儀，《東瀛警察筆記》（收入劉雨珍、孫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記》），頁 211。

## 八・結論

隨著制度的創設、改造和思想的衝擊、學習等原因，「帝國」概念從歐語圈中漂流到漢文圈，從幕末日本漂流到清末中國，再到當代網路世界。帶著其在全球空間、歷史之海漂流的痕跡，已具極多元意義。

讓我們整理一下本文所論內容。首先追本溯源，「帝國」概念源於拉丁語 Imperium，之後在歐洲語言中發展出 Reich、Kaiserreich、Kaisertum、Keizerryk (Keizerrijk) 和 Empire 等表達「帝國」概念的語詞。如前述，從日耳曼語系發展而來的荷蘭語的ケイゼレイク(Keizerryk) 是由「ケイゼ」(Keizer、帝)與「レイク」(ryk、國)所組合而成，強調其統治者是皇帝；相較之，從拉丁語系發展而來的英語 Empire 或其語源 Imperium 的重點不在其統治者是皇帝，而是政府的命令權所及之廣大區域。這兩者的差異對於「帝國」一詞被選為譯語應有重要影響。因為江戶時代的蘭學者不是從拉丁語或英文，而是從荷蘭文（其文本也翻自德文）的翻譯過程中，創造出「帝國」這個漢字語詞的。但蘭學者應不是直接以「帝國」對譯 Keizerryk，而是將其君主為「帝」，實行帝制（君主制）的國家理解為「帝爵ノ國」，並以「帝國」略稱之，爾後其他編纂字典的蘭學者在此脈絡下以「帝國」對譯 Keizerryk 乃至 Empire。總之，江戶蘭學者所謂的「帝國」是種君主制國家，但其統治者為在某種國家身分秩序中之最高位者（皇帝、天皇、沙皇、蘇丹等），且該國位於某種階層身分秩序中心，強調其獨立性、中心性。

另一方面，日本德川制度的特殊性，使如坎普弗爾等來到日本的西方知識人把德川將軍也理解為 Emperor，並以 Empire 指涉德川將軍所統治的德川國家體制，這致使美國在外交文書中，也理解日本為 Empire，稱德川將軍為 Emperor of Japan。但上述蘭學者對歐洲國家的理解，再透過後期水戶學和國學等的思想形塑後，「帝國」因此被認為當是特定用來指涉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的國家之尊稱，出現了日本當是「大帝國的大帝國」，或相對於「偽帝國」的「真帝國」這種日本中心的國際秩序思想。從而引導了以天皇為中心的「帝國」想像與後來的明治國家，即一種天皇國家的成立。

明治維新以後，知識人所使用的「帝國」或是 Empire 的譯詞，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過程中，或許德文的 Reich、Kaisertum 對於憲法條文中使用「帝國」一詞有所影響。但經過日本儒學與國學思想洗禮的「帝國」一詞實際上都無法簡單視為 Keizerryk、Empire 或 Reich、Kaisertum 的譯詞而已，憲法中所謂「日本帝國」

必須從漢文脈與和文脈來理解，即「大日本帝國」背後有其獨特的自我中心世界觀與相關思想脈絡，必須以後期水戶學和國學的語言來理解之。但隨著日本的對外擴張，日本也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其後在馬克思主義等左翼語言中，「日本帝國」、「帝國日本」等的表述方式大抵具批判性意義。也就是在十九世紀後期的帝國主義擴張的國際關係中、在漢文圈中，還有在新與舊的思想資源同時動員下，我們看到「帝國」概念與體制在日本思想史中做為一種抵抗，強調日本國家體制的特殊性、中心性，但同時也媒介源於西方之君主立憲國家、主權國家體制和帝國主義的意義。

正是這樣一種在幕末與明治日本創造出來的「帝國」概念與體制，成為清末大清政府與知識人認為可學習效法的對象。所以，通過漢文脈媒介，「帝國」與「帝國主義」等語詞被寫入清末中國的文本中，「大清國」從而也開始自稱為「大清帝國」。然而，自有天下秩序且有著滿漢族群矛盾等問題的「大清帝國」和號稱「萬世一系」的「大日本帝國」畢竟承載著不同的歷史，故對於「帝國」的想像也不盡相同。當大清政府自稱「大清帝國」時，執政者想模仿「大日本帝國」，欲將中國皇權統治下的「天下」改造為「帝國」，從而成為憲政國家，進入近代主權國家體系中，同時也希望因此愛新覺羅家的天命永續。也就是說，實際上在清末，現今用來指涉傳統帝制國家的「帝國」一詞恰恰是為了近代化清朝的傳統體制才開始廣被使用的。只是在大清政府按部就班打造「帝國」之前，其「帝國」夢已被革命毀滅。

回到當代東亞來說，不管是在日本還是中國，在經過大量歐洲知識的洗禮後，我們對於「帝國」的理解早已與歐洲語言同步。只是須注意幕末明治知識人所說、所想的「大日本帝國」，及清末知識人所說的「大清帝國」中之「帝國」都不只是 Empire 的譯語。在思想史「國際轉向」之際，我們無疑應更須注意在地脈絡的重層知識狀況。

（本文於民國一〇九年十二月一日收稿；一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藍弘岳

## 後記

本文曾於「東亞文化意象的傳衍與流通」聯合工作坊（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2019.02.25），及第三屆「東亞思想交流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文德書院，2019.03.02）口頭發表過，並在成功大學舉辦的成功人文講座（2020.10.17）演講過，特別感謝相關會議評論人陳瑋芬教授、楊儒賓教授等人給予的寶貴意見。同時亦感謝蔡孟翰教授、陳致宏教授、歐立德教授和渡邊浩教授在本文撰稿過程中給予諸多建設性意見和幫忙。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也給予本文許多中肯且具啟發性的意見，使本人獲益良多。最後，感謝陳乃蒨幫助校閱本文。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大方等大集經》，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 《西巡大事紀》，收入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第4冊。
- 王三讓，《遊東日記》，收入劉雨珍、孫雪梅編，《日本政法考察記》，收入《晚清東遊日記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北京：中華書局，1975。
- 王通著，阮逸註，深田厚齋點，《文中子中說》，大阪：文榮堂，1695。
- 王賡，〈序〉，舒鴻儀，《東瀛警察筆記》，收入劉雨珍、孫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記》。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
- 阮元校勘，《詩經》，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著，嚴復譯，《原富》，收入《嚴復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2卷。
-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冊。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第1卷。
- 梁啟超，〈立憲法議〉，新民社，《清議報全編》第2卷。
- 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 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
-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嚴遵，《道德真經指歸》，收入《正統道藏》第2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 大西猪之介，《帝國主義論》，東京：寶文館，1910。
- 大國隆正，《本學舉要》，收入田原嗣郎等校注，《大國隆正》，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0，東京：岩波書店，1973。
- 大國隆正，《真公法論并附錄》，收入田原嗣郎等，《大國隆正》。
- 小島憲之等編，《日本書紀》2，收入《新編日本古典文學全集》3，東京：小學館，1996。
- 山口義三，《破帝國主義論》，名古屋：鐵鞭社，1903。

藍弘岳

元老院編纂，〈日本国憲按〉，《陸奥宗光關係文書》61-3，一八七六年寫本，東京：国会図書館藏。

矢内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

伊藤博文編，《憲法資料》，收入《秘書類纂》，東京：秘書類纂刊行会，1935，上卷。

伊藤博文編，《憲法義解》，東京：岩波書店，1940。

吉田松陰著，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東京：大和書房，1972，第2卷。

朽木昌綱，《泰西輿地圖說》，江戸：松本善兵衛，1789。

竹尾正胤，《大帝国論》，收入《国学運動の思想》，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1，東京：岩波書店，1971。

幸徳秋水，《帝國主義》，東京：警醒社，1901。

東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學史料編纂掛編，《大日本古文書・幕末外国關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1972，第5卷。

芮恩施 (Paul Samuel Reinsch) 著，高田早苗譯，《帝國主義論：早稻田小篇》，東京：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1。

長尾龍一編，《穗積八束集》，收入《日本憲法叢書》7，東京：信山社，2001。

青野季吉，〈改譯について〉，レーニン著，青野季吉譯，《帝國主義論》，東京：希望閣，1925。

桂川甫周，《北槎聞略》，寫本，東京：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

浮田和民，《帝國主義と教育》，東京：民友社，1901。

高山樗牛，〈罪惡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時代管見》，東京：博文館，1899。

渡邊崋山，《外國事情書》，收入《渡邊崋山》，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5，東京：岩波書店，1971。

猪俣津南雄，《帝國主義研究》，東京：改造社，1928。

新井白石著，山村昌永增譯，杉田勤校訂，大槻茂質參閱，《訂正増譯采覽異言》，出版地不明，1800；東京：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藏。

會澤正志齋，《下學邇言》，茨城：會澤善，1892。

會澤正志齋，《正志齋文稿》，東京：国書刊行会，2002。

會澤正志齋，《時務策》，收入今井宇三郎等編，《水戸学》，收入《日本思想大系》53，東京：岩波書店，1973。

會澤正志齋，《新論》，收入今井宇三郎等，《水戸学》。

榎原陳政，〈李盛鐸來謁談話筆記〉，《伊藤博文關係文書（その1）》，一八九九年寫本，東京：国会図書館藏。

- 熊彼得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著，都留重人譯，《帝國主義と社会階級》，東京：岩波書店，1956。日文版譯自英文版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Translated by Heinz Norde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aul M. Sweez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1.
- 福澤諭吉，《掌中萬国一覽》，收入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編，《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9，第2卷。
- 箕作省吾，《坤輿圖識》，江戸：須原屋伊八等，1847。
- 徳富蘇峰，《社會と人物》，東京：民友社，1899。
- 穂積八束，〈帝國憲法ノ法理〉，上杉慎吉編，《穂積八束博士論文集》，東京：上杉慎吉，1913。
- 藤林普山，《譯鍵》，出版地不明，出版商不明，1810；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フランソア・カロン (François Caron) 著，幸田成友譯，《日本大王国志》，東京：平凡社，1967。
- アビラ・ヒロン (Bernardino de Avila Girón) 著，佐久間正、會田由譯，《日本王国記》，收入《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11，東京：岩波書店，1965。
- エンゲルベルト・ケンペル (Engelbert Kaempfer) 著，今井正編譯，《改訂増補日本誌：日本の歴史と紀行》，東京：霞ヶ関出版社，1989。
- ジョアン・ロドリゲス (João Rodrigues Tçuzu) 著，江馬務、佐野泰彦、土井忠生等譯，《日本教会史》上，收入《大航海時代叢書》第1期9，東京：岩波書店，1967。
- Hawks, Francis L.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China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under the Command of Commodore M. C. Perry United States Navy, by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Washington: A.O.P. Nicholson, 1856.
- Hübner, Johann. *Kurze Fragen aus der alten und neuen Geographie*. Leipzig: Gleditsch, 1693.
- Hübner, Johann, W. A. Bachiene, and Ernst Willem Cramer. *Algemeene geographie, of Beschryving des geheelen aardryks*, part III. Amsterdam: Pieter Meijer, 1769.
- Philip, Robert.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D.,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J. Snow, 1840.

## 二・近人論著

大衛・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著，胡全威譯

2013 〈思想史的國際轉向〉，《思想史》1：213-241。

王汎森

2013 〈「主義時代」的來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一個關鍵發展〉，《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4：3-88。

王悅

2016 〈由治權到帝國——從拉丁文“帝國”概念的衍生看羅馬人的帝國觀〉，《古代文明》10.2：13-23。

甘懷真

2009 〈秦漢的天下政體：以郊祭禮改革為中心〉，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93-148。

李愛勇

2013 〈新清史與“中華帝國”問題——又一次衝擊與反應？〉，朱政惠、崔丕編，《北美中國學的歷史與現狀》，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頁 196-204。

汪暉

2004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上卷第 1 部。

邢義田

2011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

明克勒 (Herfried Münkler) 著，孟翰、閻振江譯

2008 《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從古羅馬到美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張其賢

2009 〈「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東吳政治學報》27.3：169-256。

曹新宇、黃興濤

2015 〈歐洲稱中國為“帝國”的早期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15.5：52-63。

曹龍虎

2017 〈近代中國帝國主義概念的輸入及衍化〉，《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7.4：109-120。

陳力衛

2012 〈「帝國主義」考源〉，《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3：363-382。

陳正國

2020 〈亞當史密斯的帝國論述及其背景〉，《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72：131-197。

- 麥可·哈德 (Michael Hardt)、安東尼奧·納格利 (Antonio Negri) 著，韋本、李尚遠譯  
2002 《帝國》，臺北：商周出版社。
- 黃興濤  
2000 《文化史的視野：黃興濤學術自選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葛靜波、張昭軍  
2019 〈國民革命時期列寧《帝國主義論》的譯介與論爭〉，《中共黨史研究》2019.9：68-74。
- 鄒振環  
2007 《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熊達雲  
2019 《洋律徂東：中國近代法制的構建與日籍顧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趙汀陽  
2016 《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
- 劉禾 (Lydia H. Liu) 著，宋偉杰譯  
2002 《跨語際的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
- 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2014 〈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嗎？〉，《讀書》2014.1：29-40。  
2018 〈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法與概念考古〉，《探索與爭鳴》2018.6：49-57。
- 蔡孟翰  
2017 〈論天下：先秦關於“天下”的想像與論述〉，《文化縱橫》2017.4：60-73。
- 藍弘岳  
2011 〈「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22.3：71-112。  
2018 〈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述及其思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1：165-200。
- 小林武  
2013 〈章炳麟「虜憲廢疾」と「欽定憲法大綱」〉，《京都産業大學論集人文科学系列》46：127-151。
- 小森義峯  
1998 〈明治憲法とプロシア憲法の比較憲法的考察〉，《憲法論叢》5：27-47。

藍弘岳

小嶋和司

- 1988 《明治典憲体制の成立》，收入《小嶋和司憲法論集》1，東京：木鐸社。

山室信一

- 2003 〈「国民帝国」論の射程〉，山本有造編，《帝国の研究：原理・類型・関係》，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頁 87-128。

内田満

- 2007 《早稲田政治学史研究：もう一つの日本政治学史》，東京：東信堂。

木村俊道

- 2011 〈帝国〉，古賀敬太編，《政治概念の歴史的展開》第4巻，京都：晃洋書房，頁 123-153。

木村凌二、鶴間和幸

- 1998 〈帝国と支配：古代の遺産〉，《岩波講座 世界歴史 5》，東京：岩波書店，頁 3-59。

木野主計

- 1995 《井上毅研究》，東京：続群書類従完成会。

市川本太郎

- 1971 〈隋の大儒文中子の思想〉，《国士館大学人文学会紀要》3：199-237。

平田雅博

- 2015 〈帝国論の形成と展開：文化と思想の観点か〉，《社会経済史学》80.4：21-36。

石川禎浩

- 1999 〈梁啓超と文明の視座〉，《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頁 106-131。

石田勇治

- 1994 〈帝国の幻影—神聖ローマ帝国からナチズムへ—〉，山内昌之編，《帝国とは何か》，東京：岩波書店，頁 181-201。

石村修

- 1999 《明治憲法 その獨逸との隔たり》，東京：専修大学出版局。

吉村忠典

- 2003 《古代ローマ帝国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池田末利

- 1981 《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

竹内幸雄

- 2015 〈帝国主義・帝国論争の百年史〉，《社会経済史学》80.4：3-20。

- 西嶋定生  
1983 《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吳美慧  
1988 〈『英和对訳袖珍辞書』の訳語に関する一考察：メドハーストの『華英字典』との関係〉，《国語学研究と資料》12：34-45。
- 杉山正明  
2003 〈帝国史の脈絡——歴史のなかのモデル化にむけて〉，山本有造，《帝国の研究》，頁 31-85。
- 夜久正雄  
1981 〈大日本帝国憲法と井上毅の国典研究〉，《亜細亜大学教養部紀要》23：75-87。
- 岡本隆司  
2017 《中国の誕生：東アジアの近代外交と国家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明治神宮編  
1980 《大日本帝国憲法制定史》，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
- 服部裕  
2021 〈幸徳秋水の『廿世紀之怪物帝国主義』に関する一考察：近代文明の理念による帝国主義批判〉，《明星大学研究紀要 人文学部・日本文化学科》29：29-43。
- 松井直之  
2014 〈清末民初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立憲主義の継受——有賀長雄の天皇機関説に着目して〉，高橋和之編，《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東京：岩波書店，頁 93-122。
- 前野みち子  
2006 〈国号に見る「日本」の自己意識〉，《言語文化研究叢書》5：27-62。
- 紀田順一郎編  
2006 《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に関する文献解題》，收入《近代名著解題選集》5，東京：クレス。
- 桐原健真  
2008 〈『帝国』の誕生〉，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頁 139-164。

藍弘岳

- 2010 〈『帝国』の思想〉，吉田忠編，《19世紀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秩序観の比較研究》，京都：財団法人国際高等研究所，頁 111-126。
- 2016 〈「帝国」言説と幕末日本：蘭学・儒学・水戸学そして幕末尊撰論〉，明治維新史学会編，《明治維新と思想・社会》，收入《講座明治維新》10，東京：有志舎，頁 57-86。
- 2021 〈なぜ日本は「帝国」なのか：幕末日本を出発点に〉，楊際開、伊藤貴之編，《「明治日本と革命中国」の思想史：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知」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相互還流》，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頁 19-35。

馬梓豪

- 2018 〈日中比較からみる日本古代朝政の特色〉，《国際日本研究》10：151-168。

高橋作衛

- 2001 〈穂積八束先生伝〉，長尾龍一，《穂積八束集》，頁 237-244。

高橋和之

- 2014 〈西欧立憲主義はどう理解されたか——穂積八束の場合〉，高橋和之，《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頁 3-38。

張麗華

- 2020 〈メドハースト『英漢字典』における『訳鍵』『蘭語訳撰』参照の可能性：植物名稱の訳語を手掛かりに〉，《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41：1-16。

曾田三郎

- 2009 《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国》，京都：思文閣。

森万祐子

- 2017 《朝鮮外交の近代：宗属関係から大韓帝国へ》，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静田均

- 1957 〈シュンペーター帝国主義論序説〉，《経済論叢》80.4：398-413。

駒込武

- 1996 《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

韓大元

- 2014 〈明治憲法の「欽定憲法大綱」に対する影響〉，高橋和之，《日中における西欧立憲主義の継受と変容》，頁 125-134。



齋藤希史

2005 《漢文脈の近代：清末＝明治の文學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會。

2007 《漢文脈と近代日本》，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齋藤毅

1977 《明治のことば：東から西への架け橋》，東京：講談社。

藤原帰一

2002 《デモクラシーの帝国》，東京：岩波書店。

レーニン (Vladimir Lenin) 著，副島種典譯

1952 《帝國主義論》，收入《國民文庫》103，東京：大月書店。

ハンス・クルト・シュルツェ (Hans Kurt Schulze) 著，五十嵐修，浅野啓子等譯

2005 《西欧中世史事典 II：皇帝と帝国》，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

スティーヴン・ハウ (Stephen Howe) 著，見市雅俊譯

2003 《帝国》，東京：岩波書店。

ホブソン (John Atkinson Hobson) 著，矢内原忠雄譯

1951 《帝國主義論》上卷，東京：岩波書店。

1952 《帝國主義論》下卷，東京：岩波書店。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中譯本見 S. N. 艾森斯塔得著，閻步克譯，《帝國的政治體系》，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Elton, G. R.

1982 *Tudor Constitution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hosh, Durba

2012 “Another Set of Imperial Tur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3: 772-793.

Koebner, Richard, and Helmut Dan Schmidt

1964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rnicki, Peter Francis

2018 *Languages, Scripts, and Chinese Texts in East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even, Dominic

2003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London: Pimlico.

藍弘岳

Pitts, Jennifer

2010 “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214-218.

### 三・網路資訊

「中華民國外交部保存之前清條約協定」

<http://npmhost.npm.gov.tw/tts/npmkm2/10010.html>，讀取 2020.10.13。

〈恭祝 親政大典紀盛〉

1887 《申報》第 4988 期，1887.03.09，申報 (1872-1949) 資料庫，讀取 2021.06.03。

Penguinking

2018 〈帝國這個詞是舶來詞嗎？〉，知乎網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5302801/answer/292289907>，2018.01.10，讀取 2020.09.24。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of the Concept of “Empire”  
within the Literary Chinese Sphere:  
The Bakumatsu Period to Late Qing China

Hung-Yueh L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aims to expound how the concept of “empire” was translated, received, and transmitted throughout China and the literary Chinese sp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cross languages and contexts. First, I discuss how the meanings of imperium and other related concept groups, which share a relationship with “empire” in European languages, were adopted, evolved, and developed; subsequently I explore the matter of what the term “diguo” (empire) originally meant within classical Chinese. I then survey how the term “teikoku” (empire) was used by Japanese scholars with a background in Dutch learning as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keijzerryk,” or empire, in Japan, which shares a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 with China, and how it was transformed by Japanese scholars of Confucianism and of “kokugaku” (national learning) to create a particular meaning of “teikoku” within the contexts of Japanese culture. Secondly, with regards to the processes of draft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and of China’s study of the Japanese constitutional system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how the concept of “empire” was received and employed in both Meiji Japan and late Qing China. In this way,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concept and system of “empire” served as a kind of medium for Japan to establish itself as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hich had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countries. It was precisely this form of “empire” that was imita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facilitating the spread of the conception throughout China. However, despite these parallels between the Qing Empire and the Empire of Japan, I als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acknowledging the distinct histories carried by each empire, thereby influencing their imagined “empir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dvocates that when discussing how Western political concepts were adopted by countries within the East Asian,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hared contexts of literary

藍弘岳

Chinese as a medium, but also devote more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in the historical and linguistic contexts of the respective societies and countries.

**Keywords: empire; literary Chinese sphere; translation; the Bakumatsu period;  
late Qing China**